

REMEMBRANCE

記憶

DOMESTIC EDITION

国内版

Irregular Publication

不定期出刊

追忆似水年华
汇聚天下文章
建立交流平台



《记忆》275 期

方延曦专辑（三）

方延曦 古稀回望人生路

第二卷 文革狂涛冲击中的囚徒命运

第十一章 怀柔部队营房囚禁中最早知道“913 事件”

第十二章 “若在资本主义国家能当总理”的李金铠老师

第十三章 “批林批孔”中给北京市革委会贴大字报

第十四章 北京市革委会抓“黑手”抓了李金铠

第十五章 1976 年唐山大地震与我的新疆之旅

【附录九】 你要战，那就战——对蒲寿章先生《北师大文革回忆》的回应

一、关于蒲文中细节的真实与整体的歪曲

二、关于兵团若干失误的反思

三、关于所谓“给周总理贴大字报”

四、关于所谓王颂平“自我标榜一贯正确”

五、关于“标榜一贯正确”的是蒲先生自己

六、关于王颂平与谭厚兰、及宣传队斗争的性质

七、关于蒲与兵团分道扬镳的真实原因

八、关于蒲对江青“棒喝”王颂平的态度

九、关于蒲不能容忍的所谓“侮辱”——“艾芙姬庇达事件”

十、关于揭人隐私与做人之道

【附录十】 不得不补写的文字

一、关于蒲“造宣传队反”的真实原因

二、关于蒲冲宣传队组织的批斗谭厚兰大会的实质

三、并非多余的话

【附录十一】

北师大造反兵团——一个曾引起毛泽东注意的文革群众组织

【专稿】



作者简介

方延曦，祖籍安徽，1946 年 9 月 12 日生于辽宁省沈阳市，1948 年迁入北平，1969 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在 1966 年开始的文化革命中，因反对“四人帮”及其帮凶遭到长期迫害，被打成“反革命”。1979 年平反后供职于中国共青团中央机关刊中国青年杂志社，历任编辑、副主编、主编、副总编辑。1992 年辞去公职，致力于教育软件研发推广及学前教育机构创办。曾获多项专利及国家有关部门多种奖项。

古稀回望人生路

方延曦

第二卷 文革狂涛冲击中的囚徒命运

第十一章 囚禁中最早知道“913 事件”

在被关押的这 3 个多月里，我天天盼望政治形势发生变化，让我们能走出囹圄，重获自由。形势真的变了，但和我想的完全不一样。

形势变化是有信号的。早从 8 月起，部队就开始忙于参加国庆阅兵的训练，窗外天天传来“解放军进行曲”的军乐声，可是 9 月 13 日那天大喇叭突然不响了，而且一连好几天都不响，我敏感地判定：出事了！

每天晚饭后我有 15 分钟的“放风”时间，我跟看守的小战士混熟了，帮他们写过家信，教他们写过美术字，他们对我也算客气，有时放风时间会稍长一点。

9月24日傍晚我出去放风，头天刚下过雨，地上有些积水的小水坑，一张人民日报浸在水坑边上，我蹲下去看那张报纸，上面一条消息吸引了我的注意，内容是李作鹏、邱会作等为黎德寿为首的越共一个代表团送行。见我一直蹲着看那条消息，小战士走过来站在我身后问我：你看出什么了？我没回头，说，肯定有事。小战士忍不住嘴里吐出两个字：“秃子。”什么秃子？一开始我没听清，他又重复了一遍：“秃子。”我恍然大悟，站起来慢慢走回了囚室。在与外界完全隔离的状态下，我不可能做出正确判断，我一直想的是康生垮台，万万想不到林彪会完蛋。这样的结局，恐怕全中国、全世界都没有人会想到。毛钦定的接班人啊！都上了党章、宪法的啊，怎么会说垮就垮了呢？我无论如何想不明白。

这时我想到原来没太留心的一个奇怪现象，原先我们出去上厕所要走的一条路，突然不让走了，而那条路经过的一座营房的窗玻璃被报纸糊得严严实实。看守小兵神秘地小声说：那里关着一个空军的大人物。事后想，那应该就是迫降的直升机上被俘的林立果“小舰队”成员。

我还记起了一件事，当我们刚被抓进来时，就有人扬言：你们不要抱幻想了，抓你们的是黄总长的命令（指总参谋长黄永胜，他与空军司令吴法宪、海军司令李作鹏、总后勤部政委邱会作并称为林彪手下的“四大金刚”——方注）。既然林彪完了，他手下的“四大金刚”能安然无事吗？这么一想，我倒觉得好像有点盼头了。

自从林彪出事后，学习班表面上仍然抓得很紧，其实已经有所松懈。但是抓我们的说法已经有所改变，变成了：你们想想，抓人这么大的事，一个黄永胜能决定的了吗？拖拖拉拉一个多月过去，终于听说要放我们回去了。我想，单独隔离了半年，这回总可以和同学们见面了吧？我想错了。11月4日上午，我走到关押我的房外，只见一辆灰黄色的苏制胜利牌小轿车停在那里，我认得出，那正是师大的车。我明白，如此“优待”我，即使回到学校，我仍然不会有自由。后来知道，同学们早在几天前的10月31日就都放回了学校。

我没想到，新的囚室竟然就是我们曾经占据过的工5楼，而我又是在这样的状态下重归旧地。

此时 1971 年的冬天已到，我整天关在房子里，曾经毁坏过的暖气早经修好，一点也冻不着，吃饭也有人给打回来，打饭的人正是看守，不过全都换成了同班或同系的同学。虽说仍然没有自由，但要想像原来那样封锁消息是不可能的，至少每天早上中央台的新闻广播不能把我耳朵堵上不让听吧？除了广播里每天喊的“批林整风”全国人民妇孺皆知外，很快我也知道了中美接近谋求建交的世界大形势。为什么一下子转这么大的弯子？缺乏对背景材料的了解，一时我还不能理解，美帝、苏修两大敌人中美帝可是中国人民的头号死敌呀。按说外交政策上出现这么大的变化，党内党外意见不会那么统一，但当时的中国就是如此令人不可思议，硬是听不到反对的声音。但是我已经感觉到以中美接近为标志，中国的国门正在慢慢打开。当然，这件事在中国只有一个人可以做，这个人就是毛泽东。

“批林整风”中最让人吃惊的一件事发生了。为了向全党全国证明，毛主席他老人家其实早就看穿了林彪“篡党夺权的狼子野心”，中央下发了一份文件，其中公布了毛主席写给江青的一封信，信的行文非常怪异，隐隐让人感到毛泽东对林彪的不信任，而写信的日期竟然是 1966 年的 5 月，即文革爆发的前夜。更加让人吃惊的是，中央文件还公布了林彪儿子林立果组织的“小舰队”的罪行，最要害的罪行是多次阴谋杀害“全世界人民的伟大导师、全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这份文件就像一颗原子弹，在中国人民心中爆炸了！所有人都受到了极大震撼。为什么要公开这些？难道是实在没办法自圆其说而不得不出此下策？还是有人有意识地把这些东西散布出来，用来打击政敌？当时乃至其后，人们不断分析甚至猜测下发这份中央文件的背景与用意，但不管怎么说，多年来苦心营造的关于毛泽东的神话业已破灭。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竟然要谋害毛主席，这岂不是承认伟大领袖毛主席非但不是什么高瞻远瞩，明察秋毫，反而是年老昏愤，眼不明、心不亮，彻底看错了人吗？还有更加不可思议的是，文件中还公开了“小舰队”“炮制的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大毒草《571 工程记要》”，正是这个《记要》把中国人民憋了多年的心里话全倒了出来，什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啦，什么“工人下岗是变相失业”啦，什么“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来就是一大撮”啦，……

《记要》对毛的称呼竟然是“B52”，这样大不敬的称呼让人觉得毛头上的光环好象一下子就被一只无形的手给拂掉了，身上穿的所有华贵的外衣似乎也被一下子脱光了。

毋庸讳言，在当代许多中国人的心目中，毛的走下神坛正是因为 1971 年的“913 事件”。

冬去春来。1972 年春节前，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这是中美两个伟大国家的领导人在相互敌对了 20 多年之后的第一次握手，其历史意义没有人不清楚。这一事件的影响之大连我们这些身无自由的人都亲身感受到了，美国学者费正清的名著《美国与中国》竟然公开出版了，而身无自由的我竟然被允许购买了一本。这件事现在想来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其实也没有什么，毛泽东是舵手指方向，周恩来是桨手努力划呗，何况周又是那么一个做事格外细致周密的人，出版几本书算得了什么？想想美国总统尼克松登长城时遇到的奇迹吧：头天晚上还下着大雪，第二天清晨上路时，美国客人非常惊异地发现，几十公里的道路上竟然没有一点雪，那是周恩来早就安排人连夜清扫干净了。

说来有趣，从小就听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曾经把中国“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这个讲话也是这个时候在《美国与中国》这本书上看到的。

春天过去，天气渐热。有消息传来，滞留学校迟迟未能毕业的学生要分配了。平时我爱站在窗口向外远眺，这一阵子忽然有风景好看了，路上来来去去的好多女同学竟然都挺起了大肚子，原来无论革命口号怎样高喊，世俗的生活总会继续。学生都快要走光了，难道还要继续把我关下去吗？

4 月，学生陆续离校。5 月，学校里又热闹起来，加班加点新盖起一座体育馆，原来是全国五项球类比赛要在师大举行，这是形势有所松动的又一个迹象。我试探着问系军宣队的负责人大老刘：我能去看比赛吗？没想到他回答得挺痛快：行啊。我还记得这一天是 1972 年的 5 月 29 日。我出了隔离室的门，说是去看球赛，其实我是回了家。这以后，我三天两头往家跑，看守发现了，有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的想找麻烦，对我说：你可以自己出去打饭，但不能回家。我回答：要不你把门锁起来，只要你不锁，我该干什么干什么。从此以后，再没有人干预过我，我就这样在被抓被关整整 400 天后胡里胡涂地恢复了自由。

很多年后，看了不少知情人写的回忆录，才知道“913”之后毛即病倒，几乎整整一年不能视事。正是这一年里，周恩来抓紧时机为一些老将老帅落实政策，其中就有贺龙等人，当时自然是做不彻底的，但多少缓和了全国的局势。而正因此，我和李金铠老师后来在师大的故事才可以续写下去。

第十二章 “若在资本主义国家能当上总理”的李金铠老师

我所在的中文系有那么几位老师是颇值得写一写的，其中一位就是李金铠。对李金铠，驻北师大工宣队一位师傅曾如此评论：“这个李金铠，如果在资本主义国家能当上总理！”

文革前我不认识李，因为李不教我们课，师生之间没有机会来往。文革开始半年了也不认识李，后来知道，李在文革之火烧向全国时以戴罪之身毅然跑到了上海，而且竟然与王洪文、张春桥、徐景贤等搭上了关系，开始了他传奇人生的一个新阶段。

1967年元月上海文革掀起“一月风暴”时，我和颂平正在南方徒步串连，得知消息后迅速赶到上海。这时北师大又传来井岗山内部有人要造谭厚兰的反的消息，颂平估计师大斗争形势会有大变，于是急忙赶回北京。我则暂时留在上海，一边观察形势发展，一边对井岗山驻上海联络站进行“策反”，争取他们易帜倒向我们一边。

1967年1月25日，北师大井岗山战斗团发生分裂，物理系69届学生、我北大附中高中同学、与韩继东同班的李庆林等率队造反，与几个月前即退出井岗山的王颂平及被排挤的原团长郑云云等一道树起井岗山造反兵团大旗，登上北师大文化革命的舞台。

听到这个消息我加紧策反工作。当时井岗山驻上海联络站站长历史系69届学生李万庆与我是熟人，在师大问题上的观点是倾向我们的，师大内部的变化对他们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我们商定了他们公开倒戈的日子。不料，支持谭厚兰的林杰等人果然不是吃素的，政治经验老辣的他们很快就做出了反击，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批判所谓“无政府主义”的

文章，同时放出风来，说北师大井岗山造反兵团就是无政府主义的代表。文革当中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批什么东西那可是非同小可的一件事，它往往代表了中央文革的声音。这个举动果然有效地帮助谭厚兰稳定了军心，同时对反出来的人的心理造成了重大杀伤。李万庆等面对这样的形势开始往后退缩，倒戈的事绝口不再提了。

我一看这样的形势，知道在上海已经无事可做，于是也赶回了北京。这时，我在兵团核心会上经常看到的学生之外的人是中文系三个老师，一个是许嘉璐，一个是齐大卫，还有一个就是李金铠。三位老师也就比我们大个10来岁左右，都是青年助教，后来谭厚兰就因此而把他们打成我们这些学生背后的“黑手”，死揪不放，他们也都因此而经历了诸多磨难。许、齐两位老师一直就是站在我们一边的，而李在上海“一月夺权”前根本就没参加过北师大的运动，为什么这时也成了谭厚兰的对头呢？见面熟了以后，我同李的交往就多了，特别是1973、74年间我们简直无日不见，对他的情况就越来越了解。

李是非常聪明的一个人，文革前就曾经为海军编制过密码。在调进师大之前好像是在东北某工科院校工作，因为热中于文字改革，与黎锦熙、丁西林等老学者很熟，后来还成了黎的乘龙快婿。就我所知，当时中文系里竞争这个位置而最后落败者好像就不止一个。当了女婿就得为老丈人家里办事，像什么买米买菜，应该是理所当然的，算得上什么问题呢？可是，这偏偏就成了李的主要罪名。1965年，北师大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所谓“四清”，李成了“拍资产权威马屁的白专典型”，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大驾亲临师大亲口宣布开除李的党籍。同时被开除党籍的还有一位是中文系总支副书记，这位副书记本来是1958年教育革命时涌现出的“红专典型”，可到了“3年困难时期”他认为“马列”书籍没用了，竟在校园里摆摊出售。系里领导出面劝说，然而他不为所动，坚持认为搞“马列”不吃香，应该致力于专业，成为专家。一切努力归于无效，党组织在惋惜之余不得不把他也开除出党。李在告诉我这个情况时，听得出他认为自己挺冤的。他很动感情地说：参加完开除党籍的会，他没去吃中饭，一个人在主楼六楼中文系办公室的长桌子上躺了很长时间，他说：“我当时真想一头从窗子里跳出去一了百了了。”

其后没多久文革就闹起来了，李被开除党籍的身份与那些党内外被揪出来的“牛鬼蛇神”没什么区别，只能老老实实接受批判。大串连开始后，特别是国庆节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学校里人都跑光了，没有人管他们了，李说，我也造“资反路线”的反，自己解放自己吧。于是他就跑到了上海，认识了正受压的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的一些头面人物，而且当上了他们的高参，给他们出谋划策。1966年11月，上海工总司为上北京告状卧轨拦车，造成京沪线中断的“安亭事件”，上海市委书记曹荻秋与工总司谈判，李即工总司谈判代表之一。很快，在毛泽东支持下上海工总司翻了身，一月夺权后掌握了上海的党政财文大权，李作为高参当然是功不可没。之后李被派到北京担任工总司驻北京代表，在职期间出了件事，李被北师大谭厚兰的人绑架后送进了卫戍区。为什么呢？因为李对外公开表态，他在师大运动中支持谭的反对派——北师大造反兵团，谭因此必欲将李打成“黑手”，一箭双雕，把兵团和李同时置于死地。工总司得知消息出面将李保了出来，但据李说，从此，张春桥就要王洪文等与李拉开距离，而李也渐渐淡出上海的运动，与北师大运动关系日益密切。

写李金铠，有一个人物不能忽略，那就是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女教师章含之。这个章含之可是个大有来头的人物，来头之大，首先她是章士钊的养女。章士钊何许人也？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根本不知道，但这可真是个名声太大的人物。为什么这样说？说几个事就够了：他曾为营救被捕的中共创始人李大钊而积极奔走，又曾通过毛泽东资助过一些早期共产党人留学欧洲，还曾在当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时因解散女师大被鲁迅撰文痛斥过，他曾当过中国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的辩护律师，1973年他老人家还以92岁高龄第四次亲赴香港为香港9.7回归效力，结果竟病逝于香港。章含之一直与其大名鼎鼎的养父住在东城史家胡同一所红漆大门四合院里，文革后曾写过一本题为《跨过厚厚的大红门》的回忆录，引起过很大争议。更重要的是，文革前章含之又被毛泽东延请为英文老师，定期进中南海为毛泽东上英文课。文革开始后，章成了一派群众组织的头头，因其“通天”身份而备受关注。李金铠文革前曾在北外进修过英语，可能就是在那时结识了章含之。文革中，因为我们与章的

立场都是保周恩来的，这样通过李金铠相互就有了往来，王颂平也曾跟李金铠去见过章含之。我们从章那里得到过一些内部消息，其中就有周关于“清查 516”的讲话精神。文革后期，章含之随外交部长乔冠华赴美出席联合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大会，期间二人相恋并不顾各方反对执意结合。个人生活当然算不得什么，问题出在江青竭力拉拢乔及外交部几位与毛泽东关系密切的著名女“高翻”，如王海蓉、唐闻生等，据说乔上了江女皇的组阁名单，即所谓“上了贼船”，以至“四人帮”覆灭后好长时间乔都撕掳不清。不过，这个时候我们与章早已断了联系。

第十三章 “批林批孔”运动中给北京市革委会贴大字报

1972年下半年以后，文革浪潮确实低缓了许多，好像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已经斗累了，都想喘口气了，因此像我们这类被整的对象日子就好过了许多。其实全国大部分人早就成了逍遥派，即游离于运动之外，不再关心国家大事而一心过自己的小日子。这个时候，我们因为没人来斗，于是也成了逍遥派，什么也干不了，每天靠下棋消磨光阴。我学会下围棋正是在这段时间，只是我们的耳朵始终支楞着时刻关注外界的动静与风向，用毛泽东批判胡风的用语就是：“人还在，心不死”，“窥测方向，以求一逞”。

这一段时间，我和李金铠老师及几个被扣在学校不让毕业的学生，还有因不愿离开北京不服从分配的学生，差不多天天泡在一起，这其中就有与我同班的李先华和物理系那个曾写过《公社早已不是原来的国家了》大字报的李文博，他们不走是各有各的情况。

1973年人民日报国庆社论引起了我们的注意，特别是其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及“既要反右，又要反左”的提法，已经是多年未见了，不禁让人心头一热。我和李老师等讨论这篇社论，觉得可以就此做做文章。我们连夜起草大字报，中心意思就是北师大的运动也应该遵循社论的要求，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时候我们也很注意

团结不同观点的人，包括原来对立面的一些人，他们跟谭跑结果在“清查 516”中挨了整，对工、军宣队一肚子怨气，同时他们也渐渐看清了我们的观点是正确的，为人也是光明磊落的，于是主动靠拢我们，帮我们做事。我们则对他们采取了“相逢一笑泯恩仇”不计前愆的态度。这当中有一位叫姚在春，原来是师大保卫科的，贫农出身，转业军人，现在立场完全转变过来，这次大字报就是由他们出面帮我们贴的，还向我们反馈工、军宣队对大字报的态度。姚家庭孩子多，生活困难，我一直送粮票给他，他也很感激。

1974年1月25日，江青策动“批林批孔”运动，矛头指向周总理。4月，中央下发有关文件，其中提到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李老师原来认识北京市工代会的一些头面人物，几年过去他们都被以各种名义从市革委会弄了下来，怨气很大。这时候原中学红代会“四.四派”的头头、北京25中高三学生李冬民找到了他们，说起这些年的遭遇大家颇有共同语言。李冬民是代表中学红卫兵担任北京市革委会常委的，毕业后去当了兵又复员回来在一家工厂当工人，原来在市革委会的位子莫名其妙地就没有了。这些人凑在一起诉苦，当然会把问题归结到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上去。于是李就代表他们起草了一张大字报，标题很是威风：《旗帜鲜明，坚持在政权建设领域内反复辟回潮》，洋洋洒洒共有万言之多，光大字报纸就抄了30多张。

那些工人挟着大字报来找李金恺，他们觉得李是大学教师，担任过上海工总司的高参，与已贵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王洪文又熟识，请他帮助拿个大主意应该更牢靠一点。李就召集我们大家开会。这时的我们大家包括哪些人呢？除北师大几个外，有地质学院的孟繁华，邮电学院的高丕武等。孟是很有来头的：北京“一月夺权”后，孟曾在红卫兵三司的小报上写了篇社论：《打倒私字，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据说毛泽东看了很赏识，于是孟的官运就来了，地质学院红卫兵的一把手朱成昭正被中央文革责令“闭门思过”，5个所谓“勤务员”空缺了一个，孟就顶了上去。孟毕业后可能也是因为红卫兵小报这段经历而被分配到人民日报，原本与总编辑胡绩伟应该是对立的，一个是老干部，一个是红卫兵嘛，但因为不受重用，渐渐地竟与胡说到了一起。而高丕武曾担任邮电学院革委会副主

任，中等个儿，黑黑瘦瘦，看上去挺朴实，说话还带着明显的陕西口音，听说很善于演讲，全校大会上讲话，不拿讲稿，口若悬河。因为清查“516”，高被滞留于学校没有分配。

邮电学院与北师大两家校园之间原先西东相邻只有一墙之隔，为了讨论李的大字报，原来中学红代会的，大学红代会的，工代会的，一共10几个人，关在邮电学院高丕武的宿舍里开会，因为烟鬼多，又不便开门，满屋子乌烟瘴气呛死人，大家不吃不喝整整辩论了一天一夜！我自始至终参加了讨论，为了不引起工军宣队注意，来来去去都没走校门，而是翻墙而过。辩论终于有了结论，除李冬民本人外，大家一致授权师大的人修改李的大字报，李不情愿也没办法，当时，我已经发现李这个人不太善于口头表达，一着急说话还有点儿口吃。“四人帮”被粉碎后，在我等待平反的日子里，我又见到过李一回，那是他到我在西长安街的家来找我，同来的还有原中学红代会的另一位负责人、北京二中的刘龙江。为什么事，记不清了。

修改大字报的任务落在了我的肩上，说是修改，其实就是重写。李金恺老师与我详细讨论了写法，第一，不能写那么长，太长了没人会仔细看，最好一千多字拿下来。第二，不能剑拔弩张，杀气腾腾，调子应该是越平和越好。一个晚上，重写了一篇大约1800字，李给大字报拟了一个新题目：《对北京市委机关批林批孔运动我们的批评意见》。“批评意见”，态度如此之平和这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从未有过的，简直一点火药味儿都闻不到。不过我很欣赏，我认为这才体现了我们的斗争艺术，因为真正的锋芒隐藏在文字里面。其中有一段这样写道（原文未找到，回忆其大意——笔者注）：据北京市委某某领导人宣布，北京市清查“516”办了上千个“学习班”最后定案的只有一个，即“财贸尖兵”（一群众组织名称——笔者注）的徐凯，这就是说，为了给一个人定案，需要隔离上千个人，这样的做法不是扩大化又是什么呢？稍有文化的人看到此处，都会联想到蒋介石那句臭名昭著的话：“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当局者看了一定会气得要死，然而却无计可施，很难抓到把柄。

大字报最后的署名，我印象中是：鲁文阁、李冬民等若干个名字，鲁文阁原是北京市工代会的头头，他和李冬民等都曾是北京市革委会常委。

新的文稿一致通过，我又把它抄成大字报，我记得很清楚，为了字写大一点，一张纸只抄12行，连大标题总共抄了11张纸。纸张的数量也是必须考虑的技术问题，太多了，不要说看的人难有那么大的耐心，有没有那么大的地方贴都是个问题。大家决定6月12日下午张贴，就贴在北京市革委会对面的国际俱乐部的外墙上。贴大字报的那一天，因为沉默了很长时间，大家都很兴奋，特别是孟繁华，山东人，大高个儿，大骨架儿，大脸盘儿，背上草绿色的小军挎包，骑车子走在长安街上就像一阵风，他抑制不住喜形于色地感叹道：革命是盛大的节日！多少日子没这么痛快过了！

大字报贴出的当天，西方主要国家的通讯社大都发回了消息，我后来看到的就有美联社、法新社、共同社的消息刊登在6月×日参考消息的头版头条。还有一个来源不详的重要消息，说是总理办公室有三点指示：一、大字报不能撕，要保护，二、……此外，还有人说第二天上午北京市委所在地台基厂戒严，几辆墨绿色的斯各达大轿车载着中央党校中央委员学习班的学员到此看过大字报。

热闹很快就过去了，日子渐渐地平静，8月以后连“批林批孔”都不大听到提起，形势又变得沉闷而暧昧。我们照常在一起活动，也不时讨论形势，只是谁也难以说清形势会向什么方向发展。

1974年8月的一天，工军宣队召开全校大会，宣布开除颂平学籍、团籍，送原籍劳改。

从1971年5月颂平被抓到，到现在已经3年多，只知道颂平先被关在师大主楼里，后又移到11楼，始终没有自由。多年以后才知道，对颂平是全市通缉，照片放大到8寸，连远在青海工作的天文系69届同学侯业勤那里都有人去过。人抓到后先关在北京半步桥监狱的死牢里，和一个谋杀亲夫的女犯关在一间牢房。每天给的窝头颂平吃不下，匀给那个女人吃。据颂平说，那个女人半边脸上有片黑痣，看上去挺吓人。所谓“死牢”，就是房间四壁都包上软材料，让犯人无法自杀。这是颂平平反后对首任国家安全部长凌云如此描述

时凌云同志说的。过了一些天把颂平送回北师大，各个系轮流批斗，还把一些“反戈一击”的原兵团成员，如学生李先华、李国元、教师齐大卫等弄到台上面对面发言揭批。文革中的“斗”是怎么回事谁都明白，“喷气式”“坐飞机”，加上拳打脚踢，甚至把人斗得昏过去。颂平在化学系被斗时就昏了过去，这以后情况稍微缓和了一些。所谓“送原籍”不过是糊弄人，颂平原籍是上海市，能送她去上海吗？几个月后才知道颂平被送到了古北口的新城子公社，打开地图一看，那里地处北京最东北角的密云县山区，距北京最远，再往北走不了多远就到河北省了。而且他们向当地干部群众预做警告，北师大的某某人、某某人不能来，说的就是我和李金铠等几个人。

第十四章 北京市革委会抓“黑手”抓了李金铠

1974年10月的一天，工、军宣队突然通知我们参加全校大会，说有重要精神传达。我没去，李金铠老师去了，回来对我讲了开会的内容。工宣队长王强传达北京市委领导人的指示精神，该指示直接针对我们贴在北京市革委会门口的那张大字报，说：这张大字报是北京市一些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写的，不知道为什么竟省略了“资产阶级”这个从来不可少的前缀。说完这句紧跟着插上他自己的一句话：“在座的有人是听得懂这句话的”，同时目光指向坐在台下的李。王强接着加重语气说：目的是挑拨知识分子与工人的关系，挑拨北京市和兄弟省市的关系，……何以会提到什么“兄弟省市”？因为在那张大字报上李特意加了一段话，大意是说上海市在清查“516”时就注意讲政策，不随意大批隔离人。我当时感到李借题发挥的目的是想以此压一压北京市革委会，也顺便拉一拉原来上海的老关系，没想到现在成了人家的靶子。仔细琢磨一下，王强讲话措词很小心很微妙，并没有像文革中常见的那样上很高的纲，也没有当场下手扣留李。我们分析这是要给我们以警告，同时也留了一手，避免万一风向有变不至于太被动。

写到这里，发现已经好几次说到这个王强了，想起了网上提到王强的一件趣事，说这个王强在退休时要求省部级干部待遇，理由就是他当过北师大工宣队队长，相当于党委书记。此事不由人不感叹：中国大学的官本位观念实在是太厉害了！

又过了一个月，两个消息明白无误地告诉我：危险正在逼近。一个是系工军宣队有人私下给李先华打招呼：你们里面有人正在又一次滑向反革命泥坑，希望你不要陷进去。李已经分配了不肯走，因为他觉得，自己一直采取与工、军宣队合作的态度最后却闹一个“严重政治错误”的结论太亏了，又赶上后来政治气候有所缓和，他就又和我们混在了一处。然而没想到现在麻烦真的要来了，他又顶不住了，没几天就接受了结论匆匆离开了师大。

另一个信号更严重：李老师突然不见了！我估摸着可能被他们抓进去了。果然是这样，李被关了几个月放出来后告诉我，那天中午他和侯金华在虎坊桥一家小店里吃早点，突然一辆吉普车开来停在门口，李就被带走了。人是抓了但也没敢虐待，差不多可以算是一种保护性软禁，让你不能出来闹事就行，最后是不了了之。

自打1968年夏天进驻师大以来，好几年过去了，工、军宣队以及他们上头的指挥者，总觉得有一个大难题解不开，他们千方百计必欲稳定北师大的形势，因为北师大是他们控制的一个重要据点，然而我们一帮20出头的小青年就能把师大搅得天翻地覆，让他们始终不得安宁，凭什么？他们因此总是怀疑我们背后有“黑手”，揪来揪去，揪了好几年也揪不着，校外没有，校内跟当权派没有丝毫联系，没有一个当官的在文革中敢沾我们这种中央文革、北京市革委会都当成眼中钉的小组织；校内只有数得出来那么几位仅比我们大上10来岁的青年助教，刚解放时不过才上初中，也是“在红旗下长大”的，抓不住什么历史问题。许嘉璐大概属城市贫民出身，“黑五类”靠不上。齐大卫也就是嘴巴能说，压力一来就完蛋，兵团那点事没有他不知道的已经统统交待得不能再干净了，颂平被全校大会批斗时他还上台发言反戈一击。李金铠确实是党籍开除分子，可那是旧中宣部“大黑帮”陆定一干的，再说李背后总归还有那个在中央居于高位的王洪文副主席的身影在晃动。李手里有个当作护身符的道具——与王洪文副主席的合影，很多人都见过。我曾悄悄问过李：你

与上海方面关系到底怎么样？李告诉我，王洪文还可以，徐景贤不行。一月夺权后，上海工总司势力大张，这时与原上海市委机关造反的徐景贤等人的矛盾就开始了，而张春桥认为王不如徐等好控制。李就是感觉到这些才激流勇退，慢慢淡出了上海的运动。李与王的特殊关系，在我看来就是李用来保护自己的“钟馗”，而在四人帮覆灭后还给他带来点麻烦，好在，李其实跟王早就断了联系，二人之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关系，没多久就查清了。

说起来，李运气还是不错的，文革后清查“三种人”，有不少人就因为与原来台上当权者有一些说不清的瓜葛被整了多年难以解脱。更有意思的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陆定一竟亲自跑到师大，亲口为当年开除李的党籍道歉，这件事人民日报做了报道。之后，很快李就拿出了自己的科研成果——笔形码中文输入法，并在一位香港老板的资助下申请到多国专利，因此而风头大噪。后来李成为德国某大学访问学者，并担任了中国旅德科学家协会主席等职，他的妻子侯金华则在 80 年代中期就带着孩子移居德国。1989 年“6.4”期间李弄不清中国政治局势的走向，未敢贸然回国，于是曾委托颂平代他管理了一段他名下专事软件开发的“多能公司”，这个公司就设在北师大南边两站地豁口的总政排演场。李最后不幸死于意外事故，听说的版本是这样的：一次，他与自己带的一位女研究生去郊区钓鱼，手中举着德国进口的高碳钢鱼竿，8 米长的钓竿碰到了高压线，一团火球耀眼人就烧成了焦炭。这是后话。

1976 年春天，离婚多年的李金铠老师要结婚了，女方就是已经相恋几年的物理系学生侯金华。侯个子不高，体态微胖，圆团脸儿，梳两条小辫，长相一般。我没问过李为什么要娶侯，人家两人觉得挺好就行了呗。不过我从旁观察，侯对李老师应该是挺佩服的。李老师当时已过了 40 岁，一米七五左右的个子，身材适中，肤色较黑，脸上还有几粒不太显眼的浅麻子，戴一副眼镜，粗犷中不乏文雅之气。李老师真的很聪明，这不光指他单纯的智商和搞科研的能力，那个年头，这种能力根本摆不到台面上来。以他一个被开除党籍的身份，能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世道里充当弄潮儿的角色，实在是太不简单。中文系工宣队一位师傅在很多同学在场的情况下曾对李老师作过这样的评价：这个李金铠，如果在资本

主义国家里他能当上总理！他说的这种能力就是跟当权者打交道的能力，文革中称之为“政治投机”，“走上层路线”。李确有这种本领，正是这点令到兵团内部有人对其颇有微辞，有人因为弄不清他的真面目及背后关系公开表示对他的不信任，而一心想打垮我们这个组织的人也想从此打开缺口，只是始终没能得逞。

李金铠要结婚了！在那样的年头，即便一身清白者要结婚都必须有组织开具的介绍信，没有组织盖上红色大印的介绍信，一男一女敢走到一块儿，那就是“乱搞男女关系”，轻则挨批斗，重则进监牢。一个被开除过党籍、又被关押审查问题严重的人要结婚，实在是件不可思议的事。工、军宣队果然不批准，李金铠还是决心要结，而且请我帮他们张罗此事。有什么好张罗的？北师大有个被称为“四合院”的教师居住区，并不是老北京那种平房，而是四面围合的四座楼，其中一间宿舍就是李本来住的，把侯的被子搬过来，买几件做饭的家什，顶多窗上贴张喜字，亲朋好友坐在一起吃顿饭就算完事了。普通人尚且如此，李这样的身份、处境还能要求什么？我很明白，并不是让我张罗什么，而是要我来参加——如果同为落难之人的我都不来，还有什么人会来？我郑重地答应了李的邀请。

当时中国的北方正风传地震的消息，北京城里人心惶惶。父亲出门上班前总要千叮咛万嘱咐，要我看好家里已经96岁高龄的老奶奶。李结婚的日子到了，我要出门，父亲不让。我对父亲说，我答应人家了。父亲不允，说答应了也不能去。我说，我去去就来，地震没有那么巧。父亲仍然坚持不允。我从小就是个极其重然诺的人，我不能失信。实在没办法我欲抬腿硬走，父亲见状暴跳如雷要砸东西。我冲上去从后面双手抱住父亲的腰，父亲挣来挣去挣不脱，情急中竟一口咬住了我的手，我忍住疼痛就是不撒手，父亲终于松了口。我就这样走出了家门，参加了李老师的婚礼。新郎新娘不算，来宾中除了我，只有两三个平常与李走得比较近的师大同事。当时我就想，我幸亏来了。

直到今天，我手上都看得见父亲咬下的两个牙印的疤痕，然而我从来没有为参加这个具有特别意义的婚礼而后悔。在那样的年代里，在那样的环境中，这样的婚礼本身就体现了人性的不屈，显示了爱情的力量；而我则信守了我对朋友的承诺，保持了我做人的尊严。

第十五章 1976 年唐山大地震与我的新疆之旅

2006 年 7 月 28 日，是 1976 年唐山大地震 30 周年。

与文革发动 40 周年和文革结束 30 周年偌大一个中国全部媒体一言不发集体失语截然不同，此次众媒体争相举办纪念活动、发表纪念文章，煞是热闹。

我也有话要说，于是有了这篇文章。

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地震是天灾，就目前人类科技水平来讲，还无法准确预测。而就在唐山大地震发生时，在神州大地上肆虐已经十年的文革还看不到尽头，那是不折不扣的人祸。

在文革爆发之前，1962 年的 1 月中共曾召开了一次非同寻常的中央工作会议，俗称“七千人大会”。在这次会上，中共第二把手，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说了一句堪称振聋发聩的话：大跃进造成的三年困难时期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尽管从理论上说，天灾比人祸更难预防，但历史告诉我们，人祸比天灾更可怕。事实上，正是 4 年之后卷起的文革风暴，把说过这话的刘少奇打入了 18 层地狱。

1976 年 7 月 26 日，我登上西去的 79 次列车，目的地是新疆的乌鲁木齐。当时车速很慢，单程即要开行 76 个小时，也就是 3 天 3 夜再加 4 个小时。28 日列车到达甘肃的天水，停靠休息时我下车活动腿脚，听到了北京地震的消息，其实是唐山地震，波及北京。我稍作思忖便毫不犹豫地决定继续西行。后来父母曾为此而埋怨说，连你的同学都知道来问候一下平安，你却一个电话都没有。我回答：“我当时想了，如果人平安，不用问；如果人不在了，问也没用。”这就是当时被文革裹挟 10 年的青年人的回答。其实未必是心肠变得有多么硬，而完全是出于无奈：我一介逃亡书生，自顾尚且不暇，安能顾及家人的平安？

从1966年到1976年，文革持续了10年，我同国人一样，也在文革旋涡中跌宕了10年，不同的是，大多数地方的大多数人都已经该干嘛干嘛去了，而我却仍属待罪之身，不但不能毕业，还将被扣上一顶不知有多大的政治帽子。文革开始时我20岁，现在已经30岁了，按说已是“而立之年”，我却孤身子立，四顾茫然。

当时中国的老百姓并不知道，毛泽东经“913”林彪事件打击，身心皆受重创，身体已是病入膏肓。党内权争因此日趋激烈，上边已经没人顾得管我们这些戴罪等待发落的学生。眼看着国家乱成一团糟，上上下下都是无可奈何。当时没人正经上班，民间时兴自己打家具。刚好母亲学校处理一批淘汰下来的小学生课桌椅，我在家中闲来无事，找人借来几件最简单的木匠工具，把那些旧课桌椅拆散刨光再重新拼装上，刷上油漆跟新的一样。就这样，无师自通成了木匠。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4月初清明时节，百姓自发到天安门广场悼念，不料引起“四人帮”的恐慌，竭力予以弹压。因此爆发“45事件”，复出时间不长的邓小平被打成反革命“黑后台”。

我家就住在天安门广场附近，西长安街南侧临街一个院子，与人民大会堂只一街之隔，现在那里成了国家大剧院。“4.5事件”发生时我在东北营口，如果当时在北京，我很有可能被裹进去，哪怕我没有任何行动。营口是我母亲老家，那里有我母亲的一些亲属。1976年11月中旬，应他们之邀，我陪母亲回到营口。在营口一呆就是小半年，东家走走西家串串，也给人家打了些家具。

现在说起来好像挺轻松，其实木工本身就个重体力劳动，无论锯、刨、凿，跟现在什么都使机器的木工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加上我的腰有旧伤，其吃力程度可想而知。不说别的，就说那三开门的大立柜，你一个人干活，要给它翻个身都不容易。所以每天早上起床是个很痛苦的事，往往要活动好半天筋骨才能舒展开。几年干下来，不仅老的腰伤加重，还添了后背的拉伤，还有满手的伤疤和老茧，不仅手指肚上有茧，连手指侧面也有茧，那是拉锯磨出来的，不干此活好几年以后四个手指才能并拢。

在营口乡下流浪的这段时间里相处的都是农民，因此亲耳听到老乡们说出一些堪称“大不敬”的话，比如说毛处心积虑最终打倒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老乡对此的反应竟然是“狗咬狗”，我当时听了心里不禁一惊：“这也太反动了吧？”第一反应是“他们怎么敢说这样的话？”可能因为他们是贫农，出身好，不怕。第二反应是：“既然他们出身好，为什么会说这样的话？”这个问题让我思索了很长时间。诸如此类的还有一些，比如“共产党的干部没有一个是吹喇叭抬轿子把你送回家的。”意思是最后都是要被打倒才下台的。那时候干部还是终身制，一旦当上了官，没有退休一说，这话虽然没有捅破终身制这层窗户纸，但谁都明白那个意思，可谓辛辣而深刻。

那时候，我除了感到实际生活与我们这些学生在课堂上、书本里学到的东西不一样外，开始领略到民间深藏的政治智慧。就说这句“狗咬狗”，说老实话，时间又推后了许多年头，我才真正领会到这句话的深刻含义。

今天，当我写下这些文字时已经是 2015 年了，执政党的腐败，无论是规模还是数额，已经远超历朝历代：一个小小的科长，贪起来动辄就是上亿！你说可怕不可怕？然而即便已经坏到了这个地步，竟还能理直气壮地大讲什么“三个自信”！一个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里已经实行的财产公开、即“阳光法案”，在我们这个国度里竟然嚷了几十年还见不到踪影！据说，一位人大代表连续多年提出财产公开的提案始终通不过，而反对票竟高达 99% 以上，也就是说赞成票没有几张！人们不禁要问：他们究竟怕什么？

当权者其实是在掩耳盗铃，欺人自欺。上上下下都明白怎么回事，不过都在装傻。下层百姓生活在最底层，世道好坏没有谁比他们更清楚，那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凭你说得天花乱坠，他们也不会上当。但是公开场合为什么听不到“杂音”呢？那是因为生计所迫，说出真话，可能就断了自己的生路。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祸从口出”，这样的教训实在是太多了！大面儿上，都会冠冕堂皇地表示拥护、支持，内心则大不以为然，私下里、无人处，信得过的亲朋好友之间，难免流露出一些真实想法，而这些内心深处的真话，说出来就是那些“反动话”。

北京天安门“45事件”我是在营口听说的，官方广播定的调子可想而知。4月下旬我就回了北京，感觉政治气氛非常压抑。3个月后我去了新疆。

起因是1968年即分配到新疆的一个师大中文系66届校友李德录在火车上当列车员，专跑北京——乌鲁木齐这条线。当时，新疆同全国一样，物资奇缺，这个同学就利用跑车之便从北京往乌鲁木齐捣腾东西。于是我和同样待罪、后来当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许嘉璐老师就成了这个同学的采购员，我还记得，最多一次我们提着大旅行袋送到北京站20多瓶二锅头酒。当时烟酒都是凭票供应的，每月数量很少，我们既不抽烟，又不喝酒，也抽不起烟，喝不起酒，于是就把这些票攒起来，集中送给这位同学了。每次送站都是半夜，这位同学就请我们到王府井东来顺去吃一顿。这一次，这位同学和与我同班的另一位同学吴建学一道邀我去新疆，帮他们和他们的朋友打些家具，也可以顺便到祖国的西部边疆去看一看。这个提议我很感兴趣，只是哪来钱买票呢？一张车票四、五十元，差不多一个月工资呢；那时候我的工资已经被扣了两年多，掏不出钱来。李同学说，不用买票，他可以带我去。

7月26日，我开始了难忘的新疆之旅。

没有票当然没座位，我只能呆在无人的邮车里。躺在成堆的大包邮袋上，听着车轮轰鸣一路向西，禁不住浮想连翩。我想，火车就这样没白没黑地往西跑还要跑上3天3夜才能到乌鲁木齐，可离边境还有好远，如果不去新疆，你真是不知道中国有多大。我又想到，当年林则徐因虎门烧鸦片被流放伊犁，那个年代没有火车，只能靠马车长途跋涉，那得走多少天，要经历多少艰难啊！若干年后，我查到了有关资料：林则徐，于1841年被清廷流放新疆，从8月11日至12月2日整整走了122天才从西安到达乌鲁木齐。

我到乌鲁木齐已是7月底，给同学与同学的朋友们打了些家具，倏忽一个多月过去了还哪儿都没去过。新疆冬天来得早，10月即会下雪。正当我们打算抓紧时间出去逛逛时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发生了！

这一天是1976年9月8日，我住在同学吴建学家里，已经快后半夜了我却怎么也睡不着，索性披衣下床，走出门外。只见夜色阴晦，天上涌动着一团团的絮状阴云，月光几乎看不见。我突然想起了《三国演义》，不禁口中念念有词：吾夜观天象，……应有将星坠地，……这当然是开玩笑的戏说，可第二天午后就广播了毛泽东去世的消息。这虽只能说是巧合，然而至今我都觉得好奇怪。

毛去世后，在新疆避暑的各国外交官都奉命赶回北京。冬天也要来了，我怎么办？去还是留也成了问题。长时间不回学校，北师大工、军宣队肯定会找麻烦，可就这么回去了，又实在觉得有点儿冤。眼见前途一片茫然，而新疆却有那么多因种种原因避难于此没有户口的所谓“黑人”，于是一咬牙一跺脚，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我就在新疆过冬，走一步看一步，爱咋地咋地吧！

没有多少人能够料到，毛的死竟意味着文革的结束与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

当时我对前景感到悲观，我觉得江青等肯定要抓权，我们的命运肯定会更惨。没想到毛死后一个月不到，“四人帮”就被抓起来了，形势大变。

从1976年9月到1978年1月我回到北京，其间还有一年多，值得说的事情不多。

新疆的冬天很长，从当年10月到来年5月大半年都可能下雪，好像有句古诗云：“胡天八月即飞雪”并非夸张。这段时间哪儿都去不了，我只能老老实实给别人打家具。

1977年的春天到来了，国家的政治形势表面上看好像没什么变化，英明领袖还在大讲什么“两个凡是”，什么“抓纲治国”，但“四人帮”毕竟已经倒了，形势已经不可避免地有所松动，人们的心情自然也会跟着有所舒缓。我密切关注着北京的动向，希望能在一个合适的时机回去。

因为是给朋友干活，所以也得到一些方便，去过一些地方。这个朋友是自治区车队的司机，原来给自治区书记处书记林渤民开车。

这位司机姓罗，大家都喊他“老罗”。老罗没什么文化，人很朴实。他家住自治区机关大院宿舍里，三间高大宽敞的北房，木地板，带火墙，应该是过去留下的老房子。前文

说过，我在东北营口时，商店里几乎没什么东西可卖，这里情况也许稍好一些？没去过商店，不知道。他们管炒菜用的植物油叫“清油”，老罗一拿回家就是一桶，羊肉一拿回家就是半扇，不知道是否与老罗的首长司机的身份有关。当时新疆的“一把手”是曾给毛当过警卫员的龙书金，做为地方诸侯，看来比在辽宁的陈锡联及毛的侄子毛远新多少强一些。

因为老罗的关系，我跟车去过博斯腾湖，那里离乌鲁木齐不远，是一个著名风景区。四周雪峰林立，中间一潭澄碧的湖水，头顶上蓝天如洗，山坡上长满青松，草地上游弋着白色的羊群，真是风景绝佳的一处胜地。

我去过吉木萨尔回族自治县，在那里跟几个年轻的回族朋友一起去小河沟里抓过鱼，骑车跑了几十里地，屁股都颠疼了，收获不大。

去过高昌古城，说是城，其实地面上没留下什么建筑，而是在地窝子里看到过两具干尸。所谓“地窝子”就是在戈壁滩上斜着往下挖出来一个洞窟，据说好多流亡到新疆没有户口的人就住在这种地方。

去过吐鲁番。吐鲁番那可是个全国知名的地方，我留下两个很深的印象：一个是太热，正午高温 40 多度；一个是这里的葡萄架跟我们常见的不一样，特别低，你仰面躺在地上，伸手可以够到葡萄，这样的情景，想想都够惬意的。一说吐鲁番大家就会想到葡萄干儿，可是葡萄干儿是怎么制出来的，一般没人知道。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是太阳底下晒出来的，其实不然。在这里我见到了晾葡萄干儿的“晾房”，这是我给它杜撰的名字，一块块土坯垒起来，四面到处是孔洞，里边立着一根根的木杆，上边挂着一串串的葡萄。这里的气候是又热又干，一年降雨量只有几十毫米，风也大，所以葡萄干儿不是“晒”出来的，而是“晾”出来的。

去尼勒克拉苹果，我也去了。那里属于新源县，因为路况太差，苹果拉回来颠坏了一大半。

留下美好记忆的是流经那里的伊犁河，跟人们心目中一般河的概念——两边高高的河堤，中间奔腾着流水——不同，我们去的那个地方是一大片开满不知名小花的草原，河水

就在草地上流淌，你看不到河水与河岸的明显分界。这就是伊犁河！现在我就站在你身边。上高中的时候我就唱过咏叹你的歌：“伊犁河哎伊犁河，天山南北牧场宽阔，草儿青青，牛羊肥壮，马群盛旺，遍地牧歌。啊，亲爱的伊犁河，美丽的家乡，幸福的天堂，十三个民族的儿女，为你劳动为你歌唱……”可是，此时此刻，此情此景，心情并没有歌中唱得那样阳光，那样舒畅。个中原因当然就不用说了。

最值得一说的是去伊宁。我印象中汽车向东跑了两天，大部分路是戈壁滩，汽车跑几个小时，看不到一个人，一辆车。后半程经过了著名的果子沟，那是诗人闻捷赋诗吟咏过的，但是没有留下多少特殊的印象。出了果子沟再向东行就是一马平川，再无高山屏障了。60年代初中苏交恶时苏联能从这里裹胁走几万边民，跟这里的地理形势应该也有关系。再想想当年清末名臣左宗棠收复伊犁，该是经历了何等的艰险，难以想象。

到了伊犁首府伊宁，看到了清真寺，看到了众多的少数民族面孔。晚上住在政府招待所里，据说那里原是苏联领事馆，异国风格的房屋建筑座落于密密的杨树林中，参天蔽日的杨树又高又粗，一个人双臂抱不过来，应该至少有上百年的树龄了。这里可真是避暑的好地方，夏天晚上睡觉需要盖被子。

我还去了赛里木湖，那是一个高山冷水湖，湖水那个蓝呀，蓝得简直让人心醉。此湖据说水深几百米，但从未能探到底，还说湖里没有生物，不知究竟。若干年后，有人专门为这个湖写了首歌。经过这里的时候，朋友指着湖对面白雪皑皑的山峰说，翻过那些山，就到苏联了。

最后要说到一种新疆特有的东西——坎儿井。为什么要说这个？因为林则徐。历史这个东西呀，离不开地理。据说林则徐被贬伊犁在这里帮助新疆人民做了不少好事，其中就有建造坎儿井。坎儿井，是新疆地区独有的水利工程。这里极端干旱，人畜饮水，农田灌溉，全靠天山雪水融化，但因为日照长，蒸发量大，水难以保存。怎么办？办法是在地下挖暗渠，水在地下流，每隔一段挖一个竖井，把水提上来。水是生命之源，哪里有水，哪里就有绿洲。这种感悟，你在新疆体会最深。我在很多地方看到过这种坎儿井，看着浓浓

绿阴之下，沁凉的雪水潺潺流过，不禁感叹人民的智慧；遥想一百多年前，也感佩那位以待罪之身仍不忘造福黎民百姓的林则徐公。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公留下的这句名言，也是我们的座右铭。

【附录九】是我对原北师大中文系69届同班同学蒲寿章先生歪曲北师大文革历史的文字的正式回复，这是这部回忆录中最先写出的文字，时值2002年。【附录十】是对九的补充。【附录十一】，是在网上看到的一篇文章，标题是：北师大造反兵团——一个引起毛泽东注意的文革群众组织。没见到署名，但从行文中可以看出，作者是北师大文革的当事人，特别是作者还自认是北师大造反兵团的成员，他注意到毛对造反兵团的注意，他还对毛给造反兵团的定性：“省无联式的大杂烩”作了分析。其观点不代表笔者，但也算是一家之言，因有助于读者了解北师大文革历史，故收录于此。文中不确之处，笔者以加注方式作了订正。

【附录九】

你要战，那就战

——对蒲寿章先生“北师大文革回忆文字”的回应

究竟要不要写一篇文章澄清最基本的事实以正视听？看了北师大中文系同班同学蒲寿章在网上发表的有关北京师范大学文革历史的回忆文字”（以下简称“蒲文”——笔者注）之后，两种声音一直在头脑中打架。

蒲文中受到最多攻击的主要当事人王颂平是坚决反对者，她说：“他爱说什么说什么，我们有那么多要紧事干，没必要……”这种意见也不是没道理，不过“不理”还不止于这个理由，其实我想得更多：难道就因为蒲文攻击了王，也攻击了你，你就一定要做出反应？

那不明真相的旁观者会不会认为是你的气量不够大呢？在我们中国社会里这个顾虑并非多余，是啊，谁愿意被人看成心胸狭窄、睚眦必报的人呢，何况事情已经过去了那么多年？

但是不对，难道这仅仅是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个人恩怨吗？蒲文中所写可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啊，如果只是个人受点不实之词攻击所造成的小委屈当然算不了什么，否则文革中那么多受难者、特别是屈死者又该当如何呢？问题就在于这绝非个人恩怨，而且是被单方面、不真实地公之于众了，这就让人不能选择隐忍不发、听之任之的态度了。

当然也有知情者表示对蒲文很愤慨，话也说得不好听，这也是一种正当反应。

我呢，倒要感谢蒲，不是他写的这些东西，我还不会下决心现在就对师大文化革命发表意见，一是手头事情多时间紧，二是问题复杂不那么容易说清楚。现在师大建校110周年庆祝活动临近了，老同学们又要见面了，那就借这个由头说点儿想说的话，算是对那些看过蒲的大作也有种种反应的老同学的一个交待，同时也权当对校庆的一种纪念吧。

一、关于蒲文中细节的真实与整体的歪曲

蒲文中很大篇幅是他本人津津乐道的“造反优胜记略”，其中“个人情史”又是很引人注目内容，这些也许有读者感兴趣，而我所关心的当然不是这些，而是与师大文革历史有关而又被歪曲的部份。

蒲文很长，洋洋洒洒若干万字，涉及文革的部份包含许多细节，人们不得不佩服蒲先生的记忆力实在是超群，他可以把几十年前的一些非常细微的小事描绘得极其生动逼真，不由人不相信它的真实，但是无论细节多么真实，如果基本的观点不正确，也会造成整体的不真实。

简单概括蒲先生在师大文革中的表现：初期响应号召造反，按当时的观点这算一桩“功绩”；很快发现林杰、谭厚兰的问题，参与组织“造反兵团”予以抵制，这也可以算一桩“功绩”；军、工宣队进师大，造反兵团不听招呼，于是又造“造反兵团”的反，回班接受军、工宣队的领导，这在蒲自己看当然又是一桩“功绩”，否则怎么可能作为“自觉接受工人阶级领导”的典型得到军、工宣队的重用，又是进整党领导小组，又是上国庆观礼台呢？

差不多就是这样一个“三段论”，每一段方向都是正确的，都有惊人的表现，对这些蒲文都有生动的描写，特别是那几次横空出世跳上舞台单打独斗的场景简直活灵活现，让人印象格外深刻，局外人看了崇敬之情难免油然而生。

如果历史可以由一个人随意写，蒲先生尽可以自我陶醉其中，可幸的是，历史不是一个人的历史，不可能一个人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对整个文化革命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实在太大了，我这里不去涉及。官方对文革有一个结论，对这个结论怎么看，这个问题也很大，这里也不去涉及。

我要说的是，文革中的广大群众基本上是被利用的，北师大当然也不例外，尤其是文革初期。多年教育形成的对党和领袖的虔诚信仰使广大群众都卷入了文革浪潮当中，不管你是哪一派，你都是跟着指挥棒转的。你喊的口号是“打倒走资派！”“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其实你根本不知道文革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除非你不沾边，然而这根本不可能：即便是那些早早就当了“逍遥派”的人，其原因也未必是真正看透了文革的实质。所以犯错误是必然的，如果没有大的恶行也完全没有必要去追究个人的责任。

这样说岂不是“错误人人有份”？难道就没有头脑较为清醒的人？

有，不过开始时相当少。比较早就清醒且予以抵制者，现在人们知道的有：林昭、张志新、遇罗克、王申酉……等，他们付出的代价是他们的宝贵生命。

随着文革暴露的问题越来越多，觉醒的人也越来越多，当然觉醒的迟早不同、程度不同。他们在极其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努力辨别方向，希望能找到正确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困惑，遭遇挫折，包括犯一些可以理解和原谅的错误，但最终他们找到并坚持了正确的方向。多少年了，我一直在想，他们为什么能够做到？只有一个答案，不是他们特别聪明，而是因为他们坚持了做人的基本原则，在任何情况下绝不搞歪门邪道，这是个大前提，否则，在那个压力极大、诱惑极多的环境里，偏离正确的方向很容易，坚持正确的方向难乎其难。

在蒲先生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里就有这样“一小撮人”，他们因为始终坚持反对谭厚兰及其背后支持她的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而惨遭迫害。军、工宣队进师大后仍然坚持文革路线，继续对这些人进行压制，这“一小撮人”不识时务，坚持斗争，因而成了蒲先生所说的：“派性山头再现，这在当时‘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高校绝无仅有，造反兵团成为北京大专院校坚持到最后的山头。”

应该谢谢蒲先生，他的这一评价，在我们看来不啻最高的荣誉——在那样的年代中，谁有这样的胆量？！

蒲先生是师大文革前一个阶段的积极参与者，而后一阶段他响应“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与坚持“山头”的造反兵团分道扬镳了。在蒲先生看来，正确的当然是他，是一贯正确的他又一次坚持了正确的方向，因此他绝对不能忍受兵团中一些人把他视为……，蒲文回避了“叛徒”这个难听的字眼，其实当初确实有人如此看，他也为此耿耿于怀了几十年直到今天。这么看他对不对呢？可以肯定地回答：不对，至少是太过分了。但那时环境不同。文革中的青年学生都是受红色教育长大的，从小就被要求“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在共产党的字典里，凡是背弃革命的人都被称为“叛徒”，而叛徒是个太令人痛恨的角色了，把这样的帽子扣在同学头上，仅仅因为他跟你观点不同，这显然是不对的。好在当时那样想的青年学生，在经过了了几十年的岁月之后，恐怕早已提高了认识，丢掉了这些想法。

现在的问题是，不是别人还揪住蒲先生当年的所作所为不放，非要把他说成什么不可，而是蒲先生利用网络之便在自己的洋洋大文中把别人说成什么，这就有点颠倒是非、“倒打一耙”的意思了。

当别人坚持斗争时，你可以选择离开，因为在那时坚持斗争是要倒霉的，任何人都没有权力要求你跟着倒霉；而选择离开至少是平安的，甚至还可能有好处，这些好处，蒲文中都一一说到了，他确实因为自己的明智选择得到了这些好处。

这不就是当时最基本的历史事实吗？

坚持斗争的“一小撮人”最后付出的代价是在1971年4月26日以“破坏五·一大清查”的莫须有的罪名被“连锅端”，一共79个学生都被抓到北京郊区怀柔庙城解放军某部营房关押审查，还有数名工人、教师(其中包括后来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许嘉璐老师——笔者注)及造反兵团主要负责人王颂平(全国通辑一个月后被抓到——笔者注)则被关在师大批斗。兵团大多数同学在1972年夏天被分配工作，当然其去向都带有明显的惩罚性质，如果在中国地图上从东北到西南斜着划一条线，几乎都在这条线的左边。而方延曦——即笔者本人，则被关到学生全部离开师大后始终不准毕业分配，直到1979年5月平反；而王颂平则被大会小会批斗后开除团籍、学籍，遣送到北京远郊区密云县劳改(后改为到北京清河绒毯厂劳改，可能还是沾了“五大领袖”的光，因为当时他们都被弄回了北京——笔者注)，直到三中全会后的1979年4月平反，长达8年之久。

“兵团”被抓这段历史蒲文中也有提及，只是语焉不详，也许无关其痛痒，也许不了解情况，但这段历史绝对不能忽略，忽略了，师大文革的历史还是完整的吗？还能够正确认识吗(后来看到蒲文在其他章节中有对兵团被抓的反应，又补写了一节，见后文——笔者注)？

写到这里，想起当时师大人耳熟能详的一句话：“在北师大有一支一直坚持与王关戚做斗争的力量”，当兵团被抓以后，“一支一直”成了奚落兵团的玩笑话。这话并不是造反兵团自己说的，而是出自师大军、工宣队领导的一次讲话，当时形势逼得军、工宣队及支持他们的人不得不说这句话，其实这句话不过道出了师大人所共知一个基本事实。当然，当时的形势只是暂时对兵团有利，但当说这话的人发现兵团不受欺骗、不肯妥协时脸就变了，变成了前边说过的“一锅端”，不惜出动两个营的兵力，把兵团彻底摧垮。

如果历史镜头在此定格那就是个悲剧了。不过也难说，也许在有些人看来，那是件大好事：活该！谁让你们坚持“山头”，与军、工宣队唱对台戏的！然而，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历史毕竟还是公道的。

二、关于兵团若干失误的反思

我不知道蒲先生对这段历史的结局怎么看，从他写的东西看他对此好像不大满意，但不满意又能怎么样呢？事实不能改变，结局不能推翻，那么就在过程上挑点儿毛病。于是什么“外交部”啦，什么“小圈子”啦这些局外人听不懂的牢骚话就都出来了。当时那么看、有意见可以理解；现在还能那么看吗？应该可以释然了吧：当时因为斗争形势太复杂看不清楚，牵涉到的上边的“大人物”又那么敏感与危险，在那个“因言获罪”的年代里，讨论问题的范围尽可能小有什么错吗？即便是出于“自我保护”的考虑而缩小范围又有什么错吗？何况这也是对其他人的保护呀！

无须否认，那时的青年学生不过 20 出头，并没有多少政治经验，在那么复杂的环境中犯错误是正常的，不犯错误才是奇怪的。问题在于错误的性质与程度。

说到错误，兵团有没有应该检讨的地方呢？当然有，但不是在性质与方向上，而主要表现在斗争策略上，即每当矛盾特别尖锐时往往沉不住气，而轻率地采取一些比较极端的行动，如静坐、绝食等。

第一次是在 1967 年底，66、67、68 三届学生要毕业，可能对分配方案有意见还是为什么记不得了，兵团在主楼“静坐”。为应否“静坐”曾有过激烈辩论，笔者是主要反对者。1968 年 3 月，中央文革在钓鱼台办高校群众组织大联合学习班，兵团代表获准参加，“静坐”停止。

第二次是在1970年夏天，北京市委两次到师大分别检讨“右倾”及“严重右倾”错误后，兵团坚持要市委承认“路线错误”，市委不接受，结果又去市委门口“静坐”，市委书记吴德接见兵团代表后“静坐”结束。

第三次是兵团全体被抓到怀柔后，大家为表示抗议而绝食，笔者内心不同意，但不能破坏，而且因为一人塞进一间房无法沟通，也跟着绝食三天。

还有一件事肯定做得不当，至少是不聪明，那就是当军、工宣队撇开兵团单独去搞“清查516”并批斗谭厚兰时，兵团内外都有人主张“不能让他们假批判的阴谋得逞”，于是就冲击军、工宣队组织的批斗会。对此笔者是坚决反对的。我的理由是：对方是大多数，你人少，人家开一次，你冲一次，你能一直冲到底吗？再说也不得人心呀，人家举着批斗“516”的旗子，你去冲会，正好让军、工宣队争取中间群众说：你们看兵团反“516”是假的吧？真要斗“516”他们就害怕了，……

这是对外，对内失误当然也有，内部团结上不就存在大问题吗？否则今天还需要打这种笔墨官司吗？但是客观地说，这与外部压力有关，而且也不是单方面的责任，需要有条件时坐下来心平气和地沟通交换意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各自多做自我批评。可是这样做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要有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与做人起码的真诚。

三、关于所谓“给周总理贴大字报”

这件事是被蒲先生当作“重磅炸弹”抛出来的，那就是所谓反“二月逆流”时王颂平“唆使”他给周总理贴大字报的事。

对此事蒲文是这样说的：

“王颂平突然说：‘蒲寿章，用你的名义，给周恩来贴张大字报！’”

“她怎么要用‘你的名义’？她害怕。反总理可能是条‘不归路’。她想起了我：胆子大，容易冲动，少心眼，不争权夺利。批谭力夫，点‘靠边站的中央头面人物’；炮轰李雪峰，冲锋在前；退井冈山，她一提，我马上同意；安家落户，谁也劝不住。如果贴对了，是她的部署；栽了，是你自己想出风头，别想造谣中伤她。她在搞双保险。”

“王颂平为什么要铤而走险？反‘反黑党委’，谭厚兰抢第一；反工作组，高树奎领先；‘讨孔’，北师大红卫兵独树一帜；反‘二月逆流’，井冈山公社一马当先！她窥视着谭厚兰反‘二月逆流’的最终目标是谁——师大没有人怀疑。她知道自己智力，知道自己缺个‘第一’。这次她豁出去，也要争个第一，不能让谭厚兰再得第一！”

看了蒲这些话(上引第三自然段有些地方如“她知道自己智力”不通，看不明白，但原文如此，照引——笔者注)，才知道在蒲的心目中王颂平已经彻底被妖魔化了。问题是其中有两个明显的矛盾之处：第一个矛盾是，蒲给自己画的像一点儿都不像，他“容易冲动”吗？事实上他很冷静根本没动啊；他“少心眼”吗？他不是一眼就看透了王颂平的“险恶用心”吗？非但不少，在对王深文周纳罗织罪名的同时，还顺手给自己摆了部光荣史、功劳簿；他“不争权夺利”吗？兵团这么小一个一直受压的小组织有什么利可夺？可就这样不是也被蒲大造了一通反，还从宣传队那里得到了奖赏吗？第二个矛盾是，既然王“豁出去，也要争个第一”，为什么又要“用你的名义”，这不是把“功劳”让给“你”吗？蒲可能也觉察到这其中有矛盾，他的解释是“她害怕”，“她在搞双保险”。这样说蒲先生不觉得自己是在自说自话吗？你不能怎么说都有理吧？

其实蒲说的这件事在场者只有蒲王二人，局外人无从证实真伪。退一万步说即便真有此事，至多证明反“二月逆流”开始时的形势异常复杂，王颂平当时确曾有过思想混乱的时刻，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并非什么奇怪的事。当时一个流行口号是“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至于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究竟是什么，没有几个人看得清，常常需要中央文革一千人马出面指点迷津。那时经常看到的现象是，一个相当显赫的人物，昨天还是所谓“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今天就被打倒了。所以一时迷惑看不清并不是多么难以理解的事

情。就说那个“二月逆流”吧，当时的定性与“913”林彪事件发生后的定性不刚好是截然相反的吗？关键是后来的事态是如何发展的。对此蒲文中也有提及，那就是经过短暂的迷茫后王颂平与寥寥可数的几个人成立了“斗陶兵团”，在双方力量极其悬殊的形势下，继续坚持与谭厚兰及其背后支持者王关戚进行斗争，并招致长期迫害。

关于毛发动文革的背景，文革研究者王年一在其所著《大动乱的年代》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

“他(指毛泽东——笔者注)的意图，除了讲出的而外，若干问题不能公开讲出，若干问题讲不清楚。他先后给江青、康生、林彪交过‘底’，估计要言不烦，未必是长篇大论。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深深感到党内生活极不正常了，无可奈何。他们不了解毛泽东的真实意图，也不理解、不同意毛泽东的若干言论，又不得不实施领导，处于矛盾、惶惑之中。因而除加强集体领导外，凡重大问题都请示毛泽东。”

这段话中在“他先后给江青、康生、林彪交过‘底’”后边加了一条注释，是这样写的：

注：林彪 1967 年 5 月在毛泽东与外宾谈话时插话说：“有人说毛泽东就是拉一派打一派，现在中央领导同志凡是在群众中有威信的，全是毛主席事先将文化大革命的底交给他们了。所以他们未犯错误。”

看了这些就会明白，对于文革中无论老干部也好，青年学生也好，犯错误很难避免，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错误的性质及他们如何对待错误。如果他们仅是一时的迷误，能够因此而将他们一棒子打死吗？

由此我们观察到文革当中这样一种现象：即对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是不能给他贴大字报的，如果谁胆敢贴了，谁就是“反革命”。今天回过头去看这是很不正常的。无须引用西方那套“骂骂总统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标准，即便在今天的中国，我觉得给领导人提意见也不应看作大逆不道；即便意见提得不是那么正确，甚至干脆提错了，只要不是无中生有，存心诽谤，也不能打成什么“反革命”；即便真是诽谤，也应该通过法律程

序解决，领导人也无权动用专政手段进行报复。记得彭真同志在文革前说过：“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话当时被批得一塌糊涂，现在看这一条真是太可宝贵了，只是我们在很多情况下没有做到这一点。

王颂平当时就有这样的认识，针对所谓兵团“反康老”的指控，她在被抓回师大关押批斗期间，竟直接给康生写了封信，大意是：如果你真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话，你不会因为对你怀疑错了，而将怀疑你的人打成反革命云云。很可惜，这封信没有找到，但档案中肯定会有，我很想看到它的真容，只是怕要等到文革档案解密的那一天了。

四、关于所谓王颂平“自我标榜一贯正确”

对蒲先生抛出那枚“重磅炸弹”的意图我实在闹不明白：难道是想借此把王颂平如何如何？这可能吗？别说现在了，即便在“黑云压城”的当时，谭厚兰，军、工宣队不是没在这上边做过文章，得逞了吗？闹到最后王颂平不是该平反还得平反吗？想通过“翻老账”对王的平反说“不”？还是想对给王平反的中央提出警告：你们放过了一个隐藏的“反革命”？

我敢肯定蒲先生的动机未必如此“恶毒”，也许他只是想说，你王颂平也有错误，你不能“标榜一贯正确”。如果真是这样想可以理解，也不算过分，问题是王颂平什么时候如此标榜过？平反以后她从不提及文革这一段，开始我不理解为什么，后来听到她这样说：如果我当时就觉悟到，我们所做的一切（指反对谭厚兰在王关戚指使下干的那些坏事——笔者注）最后都会反到毛的身上，我早就不干了（当然，这只是她当时的认识。时间又过去了几十年，她的认识肯定还有变化。没有真正“先知先觉”的圣人，凡人总得与时俱进吧——笔者注）。平反后她为什么不教中文课而去教逻辑课？那根本不是她的专业啊。她说：我想离意识形态远一点儿。于是她满北京城到处拜师，结果很短时间就能正式给学生开课了。

从这件事中我能感受到她内心的痛切，尽管她话说得很平静。我想，她是用她选择的方式在总结和吸取教训吧。

联想到有不少当年亲身经历过文革的年轻人，好像以经历过“上山下乡”的中学生为多，在回忆往事时往往爱说这样一句话：青春无悔。作为个人对自己的历史格外珍重固然无可厚非，但其实是有很多教训应该总结的，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更应如此。

为什么要讲这一段？我就是要告诉蒲先生，王颂平至少没有你想象的那样浅薄，她从来没有把这段历史当作自己的“资本”，标榜自己一贯正确。谁这样想，谁自己难逃小人之嫌。

不过，话说回来，对于当年我们在北师大文革中的所作所为，我可以坦然地说两个字：无愧。文革初期很短一段时间里我们的确也参加过一些活动，跟着伸过拳头、喊过口号，但打人、污辱人、迫害人这类事我们一件没干过，说起来这也没什么了不起，不过就是坚持了做人的基本原则而已，然而在那样一种历史环境下，也不是人人都能够做到的，因此，这是令我一生都感到欣慰的。

说到此处，想起王颂平平反后找工作的一段往事。

第一个单位是社科院马列所。因为很多人介绍，对方同意接收，据说社科院人事局一位女局长带着两个工作人员到师大调人，师大接待者竟然说：“王颂平是造反派，你们怎么能要这样的人？”你看这事有多滑稽：造反兵团头上一直被扣着“为‘二月逆流’翻案”的“保守组织”（见1967年5月16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在北大搞军训的部队是如何支持左派的》——笔者注）的大帽子，现在怎么又成了“造反派”了？原因其实很简单：宣传队虽然已经撤走了，可师大掌权的人都是紧跟宣传队的，他们能为兵团的人说公道话吗？来人不明真相，一下子被吓回去了。

第二个单位是刚组建隶属于公安部的国际政治学院（后改称中国人民警官大学，现称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笔者注）。党委会讨论时又有人反对，理由还是师大某些人给扣上的那顶“造反派”帽子。结果院长凌云（时任公安部副部长兼院长，后任国家安全部首任部长

——笔者注)自己在后来回顾此事时说，他在“舌战群儒”之后不得不搬出彭真委员长的话：“有人说×××是造反派，第一，造反是毛主席号召的，我们这么多老干部当时都弄不明白，何况一个青年学生？第二，如果说造反还要看她反的是谁？”谁都知道，康生是彭真的死对头。于是一锤定音，王颂平进了该院，担任逻辑课教师，在该院兢兢业业工作了10年，之后选择了新的方向。在这10年里，她因工作成绩突出，几乎年年受到公安部嘉奖。

对于文革这段历史，王颂平从不提及，也不让别人提及，她认为没有什么好说的，什么原因？后边我还要解释。

我认为应该说的一点是，对于过去曾经整过她斗过她、甚至还有肢体动作的一些同学，她表示毫不记恨。这不是故作姿态，就连蒲文中不也说到王颂平要请那些同学吃饭吗？仅仅是因观点不同而反对过她的同学当然就更不会被她另眼相看了。

五、关于“标榜一贯正确”的是蒲先生自己

事实证明，王颂平没有标榜自己一贯正确，但是“标榜自己一贯正确”的人有没有呢？有，是谁呢？正是蒲先生自己。这不是信口胡说，而是有他自己写的东西为证：

“1967年‘一月风暴’我在新二教室开故事会，挑战夺了北京师大一切权力的‘井冈山公社’；1967年9月7日晚在7.27广场几千人大会上承认怀疑康老之后，此乃我在北师大文革中第三次单刀赴会：与王颂平的兵团‘角斗’，可以说三战完胜。”

前边说过，蒲先生的文革经历大体可分为三段，这三段中的每一段他都毫不含糊地认为自己坚持了正确方向。前两段那么说在事实上出入不太大，但认识与评价此时与彼时肯定不同，问题出在第三段。军、工宣队进师大以后，蒲先生贴了一张引起轰动的大字报，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其中的四个字“殊途同归”，谁同谁殊途同归呢？蒲先生说，是他已然脱离的造反兵团与谭厚兰殊途同归。

说蒲文歪曲历史，说是主要就是这一点。

2002年师大百年校庆时有个校史展览，我进去一看吓一跳，文革这一段几乎完全是空白！这简直太荒诞了：整整十年，干脆全被抹掉了！这十年里难道什么都没发生过吗？历史已经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了，而是……仔细想想也不奇怪，整个中国的文革历史不是也都被抹掉了吗？对某些人来说，这段历史最好不存在，最好全遗忘，所以巴金老人关于“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建议无人理睬。可是我们不是从小就被灌输过这样的理念吗：千万不要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到底哪个对呢？

曾经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为什么后来会分道扬镳呢？我也想过这个问题，其中的缘故始终不是那么清楚。

公开分裂的标志就是军、工宣队进师大后蒲先生那张说造反兵团与谭厚兰“殊途同归”的大字报，这个“殊途同归”的指控在当时是非常严重的。因为众所周知，谭厚兰在王关戚等支持下干了很多坏事，兵团始终抵制他们并已被证明是正确的，这是当时坚持兵团立场者的统一认识。然而突然有人公开站出来说：不对，兵团其实同谭厚兰没有什么两样，他们哪一方都不正确。那么谁才是正确的呢？不用说，当然只有他蒲先生了。可惜这只是蒲的个人看法，大多数兵团成员都认为蒲背离了他曾经坚持的正确立场。这就是为什么有人将其视为“叛徒”的原因。在我看来，扣这样的帽子大可不必，蒲的行为充其量也就只能算是“逃兵”——造反兵团的逃兵罢了。无论说“叛徒”，还是说“逃兵”，蒲本人当然不能接受，他肯定会认为他是“弃暗投明”呢，他口口声声“接受工人阶级领导”，而兵团“对抗”工人阶级领导，那么在他看来，正确的当然是他而不是兵团了。

今天回头再看这件事，我认为任何人都有选择立场的自由，包括蒲先生，退出兵团、跟军、工宣队走那是他个人的自由，问题在于他干预、否定了别人的自由，他公开跳出来指责没有如他那样行动的兵团其他成员，在那种严酷的政治环境下做出这样的指控意味着什么？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说“借刀杀人”恐怕也不为过。

问题在于，如果当时那样看还算情有可原的话，几十年过去了，蒲先生的认识竟然没有丝毫进步，仍然把此事拿出来当作他一贯正确的例证，其中暴露出的“不知今夕是何年”的乖谬，简直让人不知说什么好了。

六、关于王颂平与谭厚兰、及宣传队斗争的性质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被蒲先生严重歪曲了，那就是王颂平与谭厚兰斗争的性质以及王颂平与军、工宣队斗争的性质问题。本来这句话的主语的准确表述应该是“兵团”，但蒲硬把这样一场严肃的斗争完全歪曲成了王颂平个人的争权夺利，借用一句老话，这是关系到“大是大非”的问题，绝对不能含糊。

对于王颂平与谭厚兰之间的关系，蒲文中是这样写的：

“她(指王颂平——笔者注)和谭斗什么、争什么呢？争谁先谁后，斗谁上谁下，谁宠谁辱。”

对于王颂平在军、工宣队进师大后仍然坚持斗争的动机，蒲文中是这样写的：

“说穿了，王颂平的大联合、三结合，就是她必须进革委会。这个‘群众代表’，谭厚兰走了，非王颂平莫属。她的历史使命，就是要取而代之。”

对此让人说什么好呢？如果当时那样说就当是误会吧，如果现在还这样说，那就是彻头彻尾的污蔑。

反驳这种污蔑只要提供一些基本事实就够了。

不要以为王颂平没收到过“糖弹”，还不止一次呢：

1966年文革伊始，林杰就曾对王颂平的哥哥王志良说过：你妹妹不听话。这是相对于谭厚兰的听话而言，林是因为拉拢王颂平跟他们走不成而感到失望。

1969年中共“九大”以后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1970年师大开始抓516前军宣队政委丁元祯，两人都曾经当面亲口对王颂平封过官许过愿，那可不仅是进革委会，而是当革委会副主任，但王颂平根本就没理那个碴儿。

文的一手在先，武的一手在后；文的一手不灵，武的一手就跟上来了。如果王颂平真像蒲说的那样，还用得着后来对兵团那样大动干戈吗？

写到这里，我又犯嘀咕了：拿这个理由辩解有用吗？人家可以说那是王颂平胃口太大不满足吧？她是想当革委会主任吧？如果这样说那就什么都不必说了，只有相信清者自清吧，这可能也是王颂平反对回应的原因之一吧。不过假如世道人心竟至沦落于斯，能不让人感到悲哀吗？

说了半天，好像还是没说到蒲与兵团分道扬镳的真正原因。这个真实的原因，说老实话，当时我只是有感觉，拿不准就不能强加给别人，看到蒲的大作以后，应该说比较清楚了。

从前边引的蒲文中可以看出蒲对王的强烈不满。是什么东西引发的这种不满呢？也许这种不满由来已久，也许这种不满是由很多不起眼的小事积累而成，但这些可能都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真正端得到台面上、能说明问题的大事的确有一件，那就是1968年3月中央文革在钓鱼台举办高校群众组织大联合学习班，其间两次接见了各高校群众组织负责人。这个学习班和两次接见，破天荒竟然都让造反兵团参加了，而且是3：3，双方对等。这在过去从未有过，因为中央文革的一贯立场都是坚决支持谭厚兰而根本不承认兵团的。因此这在兵团方面看来是个重大进展。

兵团能够参加这个学习班本来是件好事，岂料麻烦就出在这里：由谁代表兵团参加呢？蒲文中关于这一段过程、包括他本人的心理活动写得格外详细，对此加以分析，也许能找到问题的答案。

七、关于蒲与兵团分道扬镳的真实原因

对于蒲与王之间矛盾的起因，蒲文中是这样写的：

“兵团恢复活动后头头是哪些，王颂平表面有意模糊，心里是明确的。”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按那次学习班的要求，一、二、三把手都必须参加学习，王颂平、铁崇光、夏晓阳参加，他们是兵团的一、二、三把手。他们是‘斗陶兵团’的骨干，‘外交部’的，论功行赏，王颂平说了算，也是必然。”

过去我影影绰绰觉得双方关系感到别扭跟“位子”有关，但人家从来没这样说过，你不能以“小人之心”主观地往人家身上安，现在看了蒲的大作我恍然大悟：问题显然就出在这“一、二、三把手”的问题上，对此没有必要躲闪。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逻辑问题吗？要求一、二、三把手参加，我没有参加，说明我不是一、二、三把手，可如果我对这个一、二、三把手的位子无所谓，我会如此反感吗？如果我对这个一、二、三把手的位子很在乎，我能对这个决定一、二、三把手的人没意见吗？如果当时不知道真相而且并没有因此闹过矛盾，今天才知道真相即便感到不满对于过去的历史有什么影响又何必再说它呢？事实上当时确实闹了矛盾却要故意绕开硬说跟计较一、二、三把手的位子没关系能说得圆吗？说了半天绕口令似的话，就是想说，蒲先生不是向来自诩很坦荡嘛，在这个问题上怎么显得有点扭捏呢？蒲文中还特意要加上“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八个字，是想说王颂平当时使用了欺骗手段把最有资格参加学习班的蒲先生蒙在鼓里了？真的蒙在鼓里，你当时应该不会闹情绪啊，事实上可是正相反啊。明明矛盾因此而起，还要特意声明当时不知情，不怕有“此地无银”之嫌吗？

蒲先生生怕别人说矛盾的起因是“争位子”，其实这就是问题的实质。看看前边引用的蒲文中什么“外交部”啦“论功行赏”啦之类酸溜溜的话，其心态不是呼之欲出的吗？可是我真是觉得有点可笑，如果说兵团为个人前途计而真有打算受“招安”的话，似乎还

有个位子好争，可兵团在军、工宣队进校后是坚持不妥协的，不妥协可是有大风险的，对此蒲不是也做出了不祥的预言吗？蒲文中曾用饱含嘲讽的口吻说：“追求真理，坚持继续革命化身的当代林道静、卢嘉川们，与领导一切的工宣队展开了顽强的注定失败的斗争。”

“注定失败”，结果让蒲不幸而言中，兵团确实失败了，只不过那是光荣的失败，而且那并非最终的结局。

现在问题的症结很清楚了，一切皆因“座次”问题而起。

呜呼！难怪历史上那么多事未成而内讧已起的先例。问题是兵团当时离分享“胜利果实”还远着呢(再说得确切一点儿，哪里谈得到有什么“胜利果实”可分享？王颂平连关带劳改一共8年，笔者本人于1973年10月、1974年6月因分别给师大军、工宣队和北京市革委会贴过大字报，为避免再次被抓而流落到东北、新疆等地，既无工资又无粮票，靠给人做木工坚持近5年，到最后不过就是平反恢复一个普通公民资格而已，拖到1979年比同学晚工作达7年之久，人家工资都长过两级了，孩子不止一个都会打酱油了——一笑。笔者注)，可分裂的导火索已经在暗中点燃了！

当然，如果站在蒲的立场上想问题也很自然：“行赏”是要“论功”的，你王铁夏三人中，就说抛开王，你铁、夏有什么功劳啊？你们写过什么有影响的大字报啊？你们领导了哪些重要的行动啊？……凭什么你们不声不响、不明不白就坐上了兵团二、三把手的交椅啊？再说了，就算承认你王颂平是一把手，你行事总得公平吧？你这么做把我蒲某人置于何地呢？

这是对一个具体事件的意见，还有平时呢，就你们几个人整天在一起嘀嘀咕咕，不管校内运动，眼睛总盯着社会，搞成个什么“外交部”，你们“圈子越拉越小”，容不得别人，……等等，等等。为了证明王的做法如何不得人心，蒲先生还把同班女同学刘桂芝拉上，为了更有说服力，话题还一直拉到十年之后，说王请刘吃饭，刘竟然说：“有必要去吗？”你看看，不是我蒲某人瞎说吧？群众对王的不满都大到什么程度啦？问题是刘早已因病去世，死无对证了。

蒲为什么要拉上这个说服力欠佳的刘做证，恐怕也是实在无人可拉了。其实这个做法效果适得其反：你们对王意见再大，但是能说出一件王对不起你们的具体事实吗？过了若干年了王不计前嫌还要请老同学吃饭，难道这也有错吗？如果被请的人非但不领情还说出那种话来，岂不是只能显得自己心胸狭隘、不近人情吗？问题是刘没有可能站出来说话了。

拿刘当枪使的唯一效果是在本已存在隔阂的同学关系之间又栽了一根刺，这真是太令人悲哀了！十年文革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所有方面给国家、民族造成的严重伤害不去说了，还有一种伤害至今令人扼腕，那就是群众的分裂，不论同学、同事，甚至同一个家庭都分成势不两立的两派互相伤害，这个创伤不知何时才能真正愈合！

写到此处，不但明白了蒲何以内心藏着那么大的怨恨，也明白了笔者本人为什么会跟着挨骂，而且骂人者的用语为什么那么刻毒了。蒲先生不止一次把“李莲英”这个帽子扣在笔者头上，刚看到时我的第一反应不是愤怒而是诧异与可笑：第一反应是：我怎么得罪蒲先生了？能拿出一点儿具体事实吗？跟着的反应是：说谁是李莲英？是说我吗？我像李莲英？李莲英何许人也？由于电视剧的影响，连幼儿园小朋友都知道。这里我不得不干一件令我自己不太舒服的事了，那就是“自我表扬”一下，而且要附带感谢一下蒲先生，因为是他给我提供了这个机会，否则我真不好意思自己主动说。从小到大，本人敢说，凡了解方延曦的人都公认，如果在方身上找优点，第一条就是正直，不错，就是正直，一就是一，二就是二，黑就是黑，白就是白，让我昧着良心说话那不可能。一个被人公认真直的人何以能跟“李莲英”扯到一起呢？就因为我坚持要王颂平在九七兵团恢复活动大会上讲话就成李莲英啦？太可笑了吧！这显然又是跟王颂平有关：有“李莲英”就有“老佛爷”，“老佛爷”是谁呢？当然就是那个“独断专行”处事不公的王颂平呗。问题还是那个：王颂平，加上方延曦，到底做过什么对不起你蒲先生的恶事，使你在辱骂同学时竟至于那么刻毒地不惜进行人身攻击呢？

现在话题又要回到蒲本人身上了，为什么他会因“座次”问题而产生那么大的怨恨，几十年后仍然耿耿于怀呢？从蒲文中可以找到答案，那就是蒲不仅本人过于看重自己头上

的“光环”，而且要求别人也得同样看重；而如果他认为别人的看重没有做到像他要求的那样，那你们就都是有罪、至少是有错之人，那这个世界就别想太平了，因为我蒲某人就不得不发难了——如他自己信誓旦旦所谓“此仇不报非蒲公”也。

写到这里我的记忆力仿佛也被唤醒了，我想起了一个很小的细节：师大工作组撤走之后，师大中二(2)班三个同学，杨树森、李先华，还有蒲寿章，联名贴出一张题为《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的大字报，此大字报蒲文中也有提及，那真是写得豪情万丈，颇有舍我其谁之概。那时写大字报都兴在前边引用《毛主席语录》，这张大字报引用的语录是“三户贫农，代表了中国五亿农民的方向。”杨、李、蒲三个人都是出身贫农。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狂得可以。

在我们生活当中有一些人，天生适合当明星，他们特别愿意生活在聚光灯照耀的舞台上，令万众瞩目。他们哪怕一时一刻被忽视都是不能容忍的，不甘寂寞是他们性格的主要特征。

这又令我想起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中某些所谓“学生领袖”的做派：不过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被人举在头顶上，向着围观的群众频频作招手致意状，那种志得意满之态至今如在目前。看着这些风头十足的学生领袖，就能够想到当年文革中的某些人曾是何等的目空一切，不可一世。

提起文革，凡有良知的亲历者，一般心情都不会轻松，因为那是“十年浩劫”，而并非“盛大的节日”，也许只有像王朔、姜文这些文革开始时还不懂事的小学生才会把那当作他们“阳光灿烂的日子”，把不上课、无人管束、甚至打老师当作最令人开心的事。

我留意到在蒲的大作之后有一些留言，看得出来大多数是未曾经历过文革的年轻人所写，有些可能是蒲的学生，对他们来说，蒲笔下文革时期的那些往事简直是太新鲜、太刺激、太令人神往了，因此对老师的“传奇经历”说些推崇仰慕之语不足为怪。但其中也有这样一位当年仅仅有10岁的小网友，她亲身经历了师大文革，她的留言让人感到格外沉重。

她这样写道：“我是在姐姐的推荐下看了您的回忆。原以为文革中尘封的往事重提会有隔世的感觉，没想到，看了您的文章，文革时候的事情竟然是历历在目，好像就发生在昨天。虽然文革那年我才 10 岁，住在师大四合院东楼。您已经不会记得我的爸爸了吧，他也是中文系的老师，只是一个老实巴交、沉默寡言的老师。我还记得师大的大学生红卫兵把我 21 岁就守寡的小脚的姥姥拉出去游街，姥姥前额上都是青色大包，不知是她被迫磕头还是被打了。……‘9.7 事件’一大早，妈妈赶我到人民医院去陪刚刚动过半月板手术的姐姐，我当时不知道师大发生了什么，只觉得爸爸妈妈很担心我的安全，有点儿莫名其妙。还有，很长时间爸爸妈妈不让我们走近工 5 楼，因为师大有一个小孩儿的眼睛在那边被打瞎了。还有，因为爱国参加青年军的爸爸被自己的学生揪斗，在牛棚一住就是一年多。吓坏了的姐姐和我多次表态要和爸爸划清界限（其实划什么、怎么划，11 岁的我根本就不清楚）。还有，我们未成年的姐妹俩因为爸爸的问题，经常受到欺辱……我很佩服您，提起那些往事还是那么潇洒。对于 10 岁以后粉红色的童年骤然变成黑灰色的我，至今想起那些日子来，依然非常、非常沉重。期盼那个疯狂的年代永远不要再来啊。感谢我宽厚、善良、智慧的爸爸妈妈，她们教会了我们不抱怨曾经恶待过他们和我们的人，不记恨那个疯狂的年代。虽然他们都已经离开了我们，他们把用微笑对待世界、对待周围的人的善良和真诚永远留了下来。只是，提起那些年代，我依然潇洒不起来。”

读了这位当年小网友的留言心情很沉重，我相信任何一个良知未泯者都“潇洒不起来”。那不是个光荣的年代，不是一个辉煌的年代，更不是一个什么人可以凭借其建功立业、为之骄矜并拿来炫耀的年代；即便是那些曾经为坚持做人的基本原则而身受磨难者，提起那个年代，所能做的也只是为国家、民族所经历的苦难而感到沉痛，并真诚地希望这样的劫难永不再现。

西方有一句名言：奥斯维辛之后没有诗歌。有这句名言，那是因为西方还有良知未泯的知识份子。

小女孩儿的父亲也是我们师大中文系的老师，如今已经故去，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在此只能对他和他的一家在文革中所受的迫害，表示深切的同情。

八、关于蒲对江青“棒喝”王颂平的态度

蒲文写到师大“9.7事件”发生后中央文革接见高校学生领袖的事：“第二天，刘桂芝（这里又把已经去世不能说话的刘拉成了自己的同盟军——笔者注）悄悄告诉我：‘昨天晚上中央文革接见，王颂平去了，讨了没趣，遭江青劈头盖脑：‘你就是王颂平？我可认识你了！我今天不和你谈！’”

“原来一心想提高知名度的王颂平，见江青见得不是时候，遭当头棒喝，你王颂平也蠢啊！”

看了这两段话我心里特别困惑：我实在不明白聪明如蒲先生者怎么会变得如此……，实在找不到合适的词儿了：王颂平遭江青“劈头盖脑”“棒喝”你高兴什么呀？你不怕别人质问你屁股坐到哪里去啦？江青“棒喝”王颂平应该谁高兴啊？好像应该是对头谭厚兰吧，为什么反而是你蒲先生呢？蒲在不经意中露出了他的立场与爱憎，而这种爱憎竟然强烈到连基本的事理都不顾，不能不让人为蒲先生感到遗憾。最令人不解的是，你当时兴灾乐祸就算了，怎么几十年后还是这样？不要“坦率”得太可爱吧。再说，江青是王颂平想见就能见的吗？江青“劈头盖脑”“棒喝”王颂平，那是王颂平的耻辱吗？那是王颂平蠢吗？江青对王颂平态度恶劣，不是恰恰说明兵团的所作所为触到了江青的痛处吗？她是因一时不好对兵团下手而恼羞成怒。尽管我们当时还看不清江青的真实面目，但斗争的性质不会变。而且事态的发展证明：兵团在王关戚垮台之后仍然坚持斗争是完全必要的，因为江青就是王关戚的后台，兵团与王关戚的斗争就是和“四人帮”的斗争，而绝对不是像蒲所说的是什么兵团在“拉山头”“搞派性”，那纯粹是给他自己的错误行为找借口。

这里有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文革后，北京高校所有群众组织的主要负责人都被关进去了，有的还判了刑，而唯一一个平反的就是北师大造反兵团的王颂平。我想这个结果绝不是偶然的，谁不愿意也挡不住。王颂平只不过一介平民，没有什么上头的过硬关系给予关照，这说明什么？说明尽管有人想把水搅混，可上边还是有明白人、公道人。

当时王颂平要求不能仅给她个人平反，同时也要给所有受她牵连的同学平反，还要给兵团这个组织平反。前两条做到了，对于给组织平反的要求的回答是：不要再追下去了，你想想，一下子抓那么多人，是一般人能决定的吗？想想也对，“9.7事件”只抓师大井冈山樊立跃、黄家林、李五全三个人都是毛泽东亲自下的令，一下子抓兵团79个人什么人才作主呢？这是个谜，这个谜底要揭开恐怕只有等有关文革的文件彻底解密的那一天了。

王颂平的平反就是对王在文革中表现所作的具有权威性的政治结论，这个事实最有力地证明，无论什么人翻出什么老账想否定也办不到。那些老账曾经翻腾过三次了，第一次是谭厚兰，第二次是军、工宣队，第三次是中央专案组，每一次都恨不得跑遍全中国，结果怎样呢？我只能说：历史毕竟是公正的。

写到此处，感到言犹未尽。俗话说，凡事就怕比较。蒲对王颂平的态度是这样，对谭厚兰的态度又是如何呢？我们还是引用蒲自己的说法吧：“1982年6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做出对谭厚兰免于起诉的决定。1984年11月1日收到龙德寿老师信，告诉‘谭厚兰因病保外就医，前不久死在湘潭家中。’谭厚兰一生未婚，终年45岁。她把一生献给了文革。我默念她好一阵子。”

说老实话，作为谭厚兰的对立面，双方之间绝非个人恩怨，我们反对的也不是她个人，而是背后操纵她干坏事的那些人。谭厚兰作为那些人的一个忠实工具，就其个人遭遇来说也不是没有令人同情之处（主要是就她个人的最后结局而言。据说她之所以被“免于起诉”是因为她交待问题态度好，这当然是明智的，也是我们欢迎的——笔者注），但她对兵团的很多做法实在太过分了：断水，断电，断粮，打人，斗人，抄家，整黑材料，放火烧楼，打成“保守组织”“反革命大杂烩”等等，简直无所不用其极……，这些不仅师大人有目

共睹，就连蒲本人不是也身受其害吗？现在蒲对谭表示了某种同情，可以理解，不能理解的是，对王颂平何以那么深恶痛绝呢？

九、关于蒲不能容忍的所谓“侮辱”——“艾芙姬庇达事件”

这就牵涉到另外一件事，因为那件事让蒲感到严重到不能容忍，因而在文字中表达了极大的愤怒，那就是所谓对他和他女友的“侮辱”。

此事经过在蒲文中大概是这样：由他借来而在同学中传看的一本书《斯巴达克斯》中有个人物名叫艾芙姬庇达，这是个妓女，被派到起义队伍中用“美人计”破坏了起义。蒲说兵团有人把他的女友说成了艾芙姬庇达，他在文中极为愤慨地这样写道：“现在侮辱××的竟然是王颂平们！”请注意这里的修辞手法：“王颂平们”，一个“们”字不仅把王颂平，而且把很多人一股脑儿都罩进去了。老实说，我确实听到过这种说法，也就是某些兵团成员对蒲投靠宣传队而且反戈一击不满，以影射方式借以表达罢了，说者与听者都既没指名也没道姓，不过心照不宣而已。但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这与王颂平无关，她恐怕连这本书都没看过，因为她没这个时间。即便有人这么说过，也说得不妥，但总不能“一竹篙打一船人”吧。蒲可能会说：我分不清到底是谁说的，所以只能把你们都捎上。于是乎蒲便怒火中烧，庄严发誓：“我憋着气，等待着机会：此仇不报非蒲公！”对此我只能说，蒲先生你不觉得打击面过大了吗？而且王颂平能为她未曾说过的话负责吗？如果非要追究王颂平的责任，顶多也就是个“驭下不严”之责吧。再说，文革中的组织大都是极为松散的，谁又管得了谁呢？至于蒲先生如何“报仇”，我们看到的就是他所写的这篇东西，口诛笔伐，算不算报仇呢？还有，王与兵团终于不出蒲所料与所想，就在蒲的眼皮子底下一个个都不少的被一网打尽，这算不算替你报了仇呢？

几千年前孔老夫子讲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蒲先生觉得受了侮辱，因之而愤怒；同理，你在侮辱别人时，就没想到别人也会因之而愤怒吗？

十、关于揭人隐私与做人之道

最后还要说几句并非与主题无关的话。

本来一个穷人家的孩子，凭着 12 载寒窗苦读，好不容易考到北京一所重点大学，不是考虑如何把学业搞好，却把大半心思放在琢磨女同学身上，挨着个儿评头品足：这个如何如何，那个怎样怎样，……别说，还真是皇天不负苦心人，无论校内的校外的，一个又一个女同学上赶着“来朝”，……他自言要找的是“城里吃供应粮的”，“有工作，自带粮票”的，而且“能干”“聪明”的，……难得的是条件这么多还真就找到了！人生若此，夫复何求？可喜可贺！

贺归贺，不中听的话还是得说出来：你蒲先生嘲笑别的同学借“大串连”游山玩水，但你公开放出“扎根农村”的所谓“接班人宣言”，不是不到两个月就自言“灰头土脸”地跑回来甚至从一开始就没真打算兑现吗？你冷眼旁观甚至讥笑别人在极其复杂的形势下看不清方向，但你不是拿着别人花钱买的月票不去搞调查而每天跑到北海公园和女友“对奕”至今还津津乐道吗？记得当时谭厚兰方面确实揭发过此事，我们还习惯地认为“又是诬蔑”。你不赞成别人的做法可以声明：我不同意，我不去。你这么干算什么？难道这也能算光明正大？别人至少还是在干正经事吧？总不能你干什么、怎么干都是对的；别人干什么、怎么干都是错的吧？世界上有这样的道理吗？……好，就算这些都是你个人的自由，旁人无权干涉，可你凭什么把那些你认为是追求你的女同学一个个“晾”在睽睽众目之下呢？在你笔下电影镜头般流过如下场景：有人紧抱你的脚，有人紧抱你的腿，有人扑在你身上哭，有人直截了当问你有没有女朋友？……J 扔了某个女同学，又有 X 扔了另一个女同学，而这些被扔的女同学又先后都跑到你的面前来……，虽然男同学都用了英文字母代称，

可大家都是同班同学，能看不出来是哪一个吗？蒲先生的文笔可谓生动又传神，可你光顾自己潇洒了，难道真的就没想过那些被你“晾”出来的一干男女同学会作何感想吗？除了这些人，还有其他一些有着这样那样看上去不那么光彩的“老底”的同学也都被你笔锋一扫在鼻子尖上“搪”了一块白示了众。我大概的印象，笔锋所及之处几乎没有哪一个能全身而退，果然是所向披靡。可是为了突出自己的光彩就非得用这样的底色来衬托吗？那可都是人家的“隐私”啊，把这些东西一股脑儿的都抖搂出来，做人是不是有欠厚道呢？

也许是为了表现英雄气概，也许是为了表示出于被迫，蒲先生反复声明他喜欢成吉思汗说的那句名言：“你要战，那就战。”很好，这句话别人听了也不会吓得打哆嗦。

以上所写就算是我的“应战”吧，除了澄清事实的部份外，“反批评”只有两条，从中可以引申出来的忠告也只有两条，一条是做人低调一点儿好，一条是做人厚道一点儿好；如果实在难以跳出昔日头上的耀眼光环，如果实在忍不住非要“自我表扬”的话，也没关系，至少不要抹黑别人。这应该是做人的底线吧。

好了，也许这篇文章到此可以划个句号了。为什么说“也许”，那是因为我不知道蒲先生看了之后是否更加“气不甯儿”而“蒲颜大怒”还要“再战”，不过，我可以预先撂下一句话，该说的道理也说得差不多了，都是很浅显的，如果没什么新鲜的东西，那就实在没必要缠斗不休，有些事自己清夜扪心自问无所愧疚就行了。📌

方延曦 2002年

【附录十】

不得不补写的文字

开始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并没完整地看过蒲写的东西，那是一年多以前为了查资料时偶然看到的，东一篇西一篇，没头没尾，既不连贯也无顺序，草草看过留下个大概印象就撂在了一边没当回事。后来不断有同学问起此事，而且对其内容颇有微词，于是我就开

始了“回应”还是“不回应”的思想斗争。当我终于想明白了，这并非个人恩怨而是事关师大文化革命的历史真相与基本评价因而决定回应时，想的还是比较简单：把那些被蒲文歪曲的主要史实澄清就行了。快要写完时为核对引文不得不再翻查蒲文，这一下发现原来有些章节没有看到，而且问题也不像我原来想的那样简单：蒲脱离兵团回班说是“接受工人阶级领导”，可他竟然跟宣传队也闹崩了，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仔细看了蒲文中有关章节才知道，原来我们这位蒲先生真不愧为天生的“老造反派”，继造师大党委反、造师大工作组反、造师大井冈山反、造造反兵团反之后，他又造了宣传队的反，真可谓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啊！从他最后这一段造反史中我们更加真切地看到，原来在蒲的心目中他所痛恨的真正敌人究竟是谁。

一、关于蒲“造宣传队反”的真实原因

蒲为什么要“造宣传队的反”呢？请看蒲文所叙述的缘由：

“宣传队指挥部领导，军宣队的孙副政委，工宣队的王强队长，特别是曾参谋，刚进师大后一直对我很客气，肯定我在宣传队进师大以来的表现。”

从蒲文的叙述中读者知道蒲对兵团反戈一击的举动是得到宣传队充分肯定的，而且得到了相应的回报，如让蒲进“整党领导小组”、上国庆观礼台，……等等。

蒲与宣传队的矛盾因何而起呢？

读者看到蒲文中单独有一章，标题是《单挑王连长》，其中详述了他与这个王连长的矛盾冲突。王连长就是军宣队派到中二(2)班的领导，在蒲笔下这个王连长是个形像很为不堪的角色。二人的冲突来自很小的一件事：打乒乓球时，别人巴结王，主动让王打，而王打输了往往不肯下来。轮到蒲时蒲不买王的账，这让王很下不来台。还有一次，学生快分配时蒲认为王要借掌握分配大权之机大耍淫威，在一次王训话时蒲又给王一个难堪，冲突

就这样公开爆发了。这之后，一次看内部电影，王竟不发给蒲电影票，反而派蒲与同班两个有点“问题”的同学去挖防空洞，蒲认定这是王打击报复。其实这点儿矛盾毫无意义，不过是蒲与王个人之间因为一些非原则性的小事引起的纠纷，甚至是意气之争：蒲看不惯王的飞扬跋扈，王不容忍蒲的不买账。

真正的原因当然不在这里，那么到底在哪里呢？

就在宣传队迫于当时的形势，不得不暂时改变压制兵团的态度，在谭厚兰被弄回师大进行审查批判时让兵团参加了批判大会并发言，仅此而已。

这样说有根据吗？有蒲的亲笔为证。请看：

“1970年6月，谭厚兰被召回北师大隔离审查，交待问题，她从此失去了自由。”

“造反兵团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他们既批谭厚兰的种种罪行，又批工宣队进学校后支持井冈山、革委会的‘右倾’路线。”

在这样的背景下，宣传队召开了全校批斗谭厚兰大会。这次批斗会有兵团负责人王颂平发言。

出人意料的是，这次大会让蒲给冲了。请看蒲文的描写：

“长久埋在心里对王颂平的怒火爆发了，被宣传队的绥靖政策激怒了。我没有宣传队刚进师大那么顺从了。”

“兵团想借助恶毒谩骂封住我的口，我给了他们致命一击。”

“我拿起麦克风：‘我要发言——’”

“趁王强犹豫，我直奔主题：‘造反兵团是北京最后一个非法的山头！’”

“今天，工宣队放弃领导，让兵团负责人批判谭厚兰，就是山头主义合法化，我坚决反对！”“继‘故事会’‘9.7辩论会’之后，这次，我又‘单刀赴会’，冲了王颂平批谭厚兰。”

蒲用相当得意的口吻写出了上述文字，他以为这是他个人“造反优胜记略”中十分光彩的一页，殊不知不仅反映出他与宣传队矛盾的真实性质，而且暴露了他对造反兵团的真实态度：不要说让兵团翻身了，连生存都不可以。

如果不是后来又读到了蒲写下的这些文字，我真不敢相信蒲先生内心埋藏着如此深重的仇恨，谁跟谁呀？至于吗？我终于明白了，什么叫“咬牙切齿”，什么叫“不寒而栗”。

这次冲会，表面是冲着宣传队去的，但最终目标还是兵团。这样说有充分根据，因为会虽然是宣传队组织的，但第一个发言的是兵团的王颂平。我们可以做个假设：如果这次批斗会没有兵团发言，蒲先生还会去冲会吗？答案再清楚不过了。蒲原来跟宣传队相敬如宾，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宣传队领导“对他很客气”。是什么惹火了蒲先生以至于反戈相向呢？或者说宣传队“错”在哪里呢？宣传队错就错在他们竟然给了兵团以批斗谭厚兰的发言权。这还了得！在蒲看来这简直就是大逆不道！还管你宣传队客气不客气！

这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在蒲心目中，兵团才是他的死敌。你看，就连王连长也许仅仅是出于个人关系的原因不发给蒲电影票这么一件小事情，蒲也能琢磨出“微言大义”来。

他这样写道：“我琢磨，取消我看‘内部电影’的资格，是宣传队发出的什么信号呢？他们潜移默化、接受了兵团‘代表一个半群众’（此处有语病，其意是指兵团的人认为：蒲只代表他自己和他的女友，他自己算一个人，他的女友算半个人——笔者注）的观点，推行近乎公开承认兵团合法存在的绥靖政策，受到我坚决抵制后，认为我是胆敢和宣传队唱对台戏，头上带‘刺’的‘闹’派人物，进而认为我和谭厚兰、王颂平一样，是存在炮打过‘三红’的问题人物。”

“我明白与宣传队分道扬镳是早晚的事情。”

看清楚了吗？这些告白不是把蒲的内心世界合盘托出了吗？如果有谁还甜蜜蜜地认为蒲与兵团之间的矛盾不过是个人恩怨的话可以清醒了，至少蒲先生自己是万万不承认的。

对这段话确乎不可等闲视之，对其中的内含有必要认真分析。

“绥靖政策”。如果没记错的话，这个名词是用来形容二次大战前英法两国当政者对于希特勒德国采取的纵容姑息政策，结果是养虎为患，法西斯德国发动了二次大战，导致几乎整个欧洲陷于沦亡。

文字是有感情色彩的，用这样的词语去形容宣传队，尽管不敬，但毕竟还是注意了留有分寸。然而“绥靖”的对象是谁呢？或曰真正的敌人是谁呢？兵团！

为什么蒲要“坚决抵制”宣传队呢？因为在他看来，宣传队有“推行近乎公开承认兵团合法存在”的危险。这就是说，蒲要先发制人，把可能出现的危险扼杀于摇篮之中。换言之，对他自己曾经呆过的兵团，蒲已经深恶痛绝到了不能容忍其存在的地步，也就是说，他比宣传队走得更远，他恨不得将兵团赶尽杀绝。

可是，我真想知道：兵团的合法存在到底有什么危险？蒲先生能告诉我们他怕什么吗？

如果有人认为这样说有“诛心”之嫌，那么我们再看一下蒲先生的亲笔告白：

“1971年4月29日（此说不确，应为26日——笔者注），10多辆军用卡车，载上百名男女警察，进入师大（此说也不确。应是两营部队，未从校门进师大，而是将车停于临街的中南楼外的马路上，从原先已经打开的围墙豁口中出入——笔者注）。直奔中南楼，布下警戒，然后蜂拥入楼，敲门抓走在梦中醒来的所有男女！”

“我第二天早上知道，就到中北楼西头下面，向中南楼望去，人去楼空。我没有进楼去，不愿意让人误以为我幸灾乐祸。师大文革中两员女将都被抓了，她们就这样“殊途同归”了，默默想起王颂平在工五楼“算命”，得“多行不义必自毙”“玩火自焚”辞条。……”

这段话重提了蒲在前边写到的所谓“算命”一事，想告诉读者什么呢？原来“多行不义必自毙”与“玩火自焚”两个词就那么切合地用在此处，罪有应得，岂非天意？

为了诅咒王颂平，什么手段都使上了。我想请蒲先生说一说：王究竟都行了哪些不义？

还用人们“误以为”吗？说“兴灾乐祸”未免太轻飘了吧？蒲忍不住把内心最隐密之处都亮出来了：谭厚兰被抓了，王颂平也被抓了，这不是蒲最希望看到的结果吗？谭、王两人都被抓了，不是更可以证明在师大只有蒲才是唯一一贯正确的吗？

二、关于蒲冲宣传队组织的批斗谭厚兰大会的实质

还有一个问题不能不提出来，那就是蒲自鸣得意的三次“单刀赴会”中这第三次——冲军、工宣队组织的批斗谭厚兰大会到底说明了什么？军、工宣队可是伟大领袖派来的，也是蒲本人一再表示“自觉服从”其领导，以此为荣并与兵团划清界限的，于是问题就来了：为什么蒲不仅敢于冲这个会，而且单枪匹马就能够冲掉呢？这个结果难道不令人感到奇怪吗？可是对此从来无人注意，似乎理所当然的正常，也许就连蒲本人都没想过，军、工宣队何以在他的“挑战”面前竟然连招架一下都不肯就顺水推舟把那么重要的一个大会给推掉了？如果军、工宣队真想开这个大会的话仅仅因为蒲这一冲就开不成了吗？蒲难道真有那么大的神力吗？笑话！你蒲上台攻击完兵团就完了吧，总不能赖在台下不下来吧？就算蒲脸皮厚不肯下台，难道就没办法了吗？文革时特别爱讲所谓“斗争大方向”，当时的“斗争大方向”是什么？不就是批斗谭厚兰吗？蒲冲会不是“干扰斗争大方向”吗？难道这样的理由都顶不住蒲的那么一冲吗？有多大的问题不能会后解决呢？可军、工宣队就是借着蒲的这一冲即宣布“散会”了，配合得如此默契，背后有隐情？

蒲文中曾写到过他与人“摔跤”的一个小细节，他以为人家摔不过他而得意，一直得意了很多年。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细节，倒也很能透出一个人的斤两来。直到他的亲爱者提醒他：人家不是摔不过你，人家是刚摔倒过一个大大个子，累了。显然，宣传队之所以不跟蒲“摔”，不是“摔不过”，而是“不想摔”。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军、工宣队需要这种效果，而蒲刚好自觉地充当了这种角色。本来批斗谭厚兰就很勉强，而且还得让兵团出面就更不愿意了，只不过是当时的特殊形势所迫不得不为而已，现在有人出来搅局，还是从你们兵团里反出来的人，那何乐而不为等着看笑话就是了。当兵团上台抗议军、工宣队纵容蒲冲会的行径时，工宣队长王强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蒲寿章是你们兵团的头头！

能够想象得到王强在说这句话时内心窃笑的的神情吗？凡经过文革的人都知道，文革中军、工宣队的权力有多大，如果蒲真的触犯了他们其后果将会如何，然而蒲不仅毫发无损，甚至这还成了他个人“优胜记略”中光彩的一章，还要浓墨重彩地加以重现。这说明了什么？只能说明蒲一直在充当军、工宣队的工具，在这之前就是工具，这次冲会也是工具，表现形式不同罢了。而他本人至今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无须再多说什么了。特别让人震惊的还是蒲文中所暴露的蒲内心世界的阴暗程度：人对人的仇恨何至于如此深剧？！请人们注意，这可是在历史已经走过了 40 年之后啊，让人说什么好呢？！

这件事足以让所有善良的人们反思：如果是非颠倒，黑白混淆，忠奸不分，以丑为美，任由历史被搅成一团浆糊，该是一件何等可怕的事情！

三、并非多余的话

在文革那样一个极其特殊的年代里，各色人等呈现出种种不同的命运与姿态：有人狂欢，有人悲泣；有人逍遥，有人苦斗；有人昏睡，有人思考；有人沉沦，有人觉醒……

作家林达在一篇题为《新一代德国人为什么能有民族自信》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2005 年，在柏林的勃兰登堡门旁，建立起 19000 平方米的欧洲遇难犹太人纪念碑。在那里，也随时可以看到一群群中学生在上历史课。德国人的自信来自正视自己的历史，也确立了象征真正德国精神的英雄，这些英雄追寻的价值，不仅是德国的，也是普世的。

“我想起中国人也常常提及国民性，因为我们有过文革这样的疯狂。可是在疯狂中，也有无数对疯狂的抵抗者。假如我们回避自己历史中的黑暗和罪恶，假如我们对青少年的教育中，不提及我们黑暗年代中的那些英雄、不确认他们和普世价值同构的民族精神，那么，我们的价值观和世界观都可能是混乱的，我们的民族自信也可能是虚妄的。”

相比德国人的磊落，日本人则是委琐渺小的，他们始终不能正视侵略别国的罪恶历史，结果便是他们永远得不到别国人的谅解，他们也就永远不可能真正抬起自己的头。

我们中国人应该以谁为榜样？德国人还是日本人？

有一句名言这样说：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

难道在蒲先生看来，“最后”还未到来？“最好”还不能确定？难道他还在期待另外的一种结局？

除了他自己，没人说得清蒲先生内心究竟在想什么，而我们能确定的一个基本事实就是：“四人帮”不可能卷土重来，宣传队统治上层建筑的历史不可能重演，每个人自己写下的历史不可能任人涂抹得面目全非而致黑白混淆、是非颠倒。

也许有人会问：驱使你写出回应蒲文的文字的动因是什么？

我非常认真地想过这个问题。这不是一个非回答不可的问题，但是我愿意回答。个人恩怨？无稽之谈，至少在我这方面找不一点根据。与蒲本人，即便双方矛盾尖锐，对立严重，然而在长达几十年中我们始终没有过正面的交锋。为什么？没有这个必要。他文中愤愤提及的“叛徒”称谓出自何人之口我们不得而知，其内心的耿耿于怀确是可以想见的，问题是我们这一边会把这样的一件事当成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吗？

这里，我想披露一个小细节，是在蒲与我们已经 20 多年无联系的情况下发生的。

那是九十年代中后期，我正在香港工作，突然有一天接到了孙碧琼——蒲的亲爱者的电话，说实话，我真的吃惊不小，一是这么多年毫无联系她从哪儿弄到我的电话号码的？更让我吃惊的是她对我提出的要求——要我帮蒲在香港找个工作。我压住心中的吃惊，告诉她：这件事我办不到，因为来香港比去美国还难。我说的是实话。这是双方这么分手多年当中唯一的一次联系。事后，我把此事告诉了颂平和几个同学，大家都觉得此事有点怪，一是如果和别人关系闹成这样，是不会向别人开这个口的；二是对香港的事务如此无知。

这件小事并没有忘记，可是一直没有写入本文，因为还是不愿落个“小人之心”的嫌疑。可为什么犹豫再三还是做了这点补充？原因无他，为了还原历史：也许这个小细节也是加深蒲内心怨恨的原因之一？

但是如果蒲不写那么一篇东西，你还会就北师大文革的历史说些什么吗？

当然会说，这是确定无疑的——不仅对北师大文革的历史，而且对整个文革的历史。

可是时间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你为什么始终没有说？

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太忙，手头的事情太多而且放不下，无暇分心。如果再要说得具体直接一点儿，那就是颂平和我都在年近半百时辞职了，不仅把乌纱帽扔了，连公职也扔了，这就意味着我们首先要为最基本的生存权而斗争——谁都知道，在现时中国的环境下这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另一个是许多关系到文革性质、背景等的重大问题没想清楚，当然这不意味着我对蒲文中提到的北师大文革的那些基本史实与是非的看法有任何含糊之处。

2002 年北师大校庆 100 周年时有一个校史展览，我特意进去看了一下，不看则已，一看极为震惊，不错，确是震惊：北师大 100 年的历史竟然没有文革十年那一段！除了中四学生金宏达以“时汉人”为笔名在文革开始前写了一篇与姚文元批判吴晗文章商榷一事有一幅展板外，整个师大文革的历史竟是一片空白！我们中国以历史悠久著称，历朝历代都有详实的文字记载，以至形成一部洋洋洒洒、蔚为大观的二十五史，为什么独独文化革命这 10 年完全失语？是不好说、是不愿说、是不敢说、还是不能说？要知道这可是我们这一代人所亲身经历的历史，难道还要等没有经历过这一切的我们的后代替我们来写这一段历史吗？如果“不说”的原因是“说不清楚”，那我们的后代反而能说得清楚吗？

说，还是不说，这是一个问题。

说，还是不说，这不是一个问题。☞

方延曦 2003 年

【附录十一】

北师大造反兵团**——一个曾引起毛泽东注意的文革群众组织**

佚名

前 言

1968年7月28日，为了制止北京高校的武斗和彻底解决红卫兵问题，毛主席在凌晨紧急召见了红卫兵五大领袖。毛泽东对他们做出了最严厉的批评和警告，实际上宣告了红卫兵及其“五大领袖”的末日。在这次文革中最重要最严肃的召见中，毛泽东对谭厚兰讲了这样一句话：“谭厚兰，文化革命两年了，你那一个两百人的兵团也没解决得了。弄得你睡不着觉，……”

这个“两百人的兵团”是怎样的一个组织，居然能引起最高统帅毛泽东的注意，在决定红卫兵最后命运的关键时刻，还念念不忘地提起？

兵团的全名是“北师大井冈山造反兵团”（以下简称“兵团”），是个规模很小的红卫兵组织，但它值得人们注意的，却远远不止这一点。

（一）在北京高校的群众组织中，“兵团”算是出道最晚的。1967年9月，北京市的高校已实现了表面上的大联合，有了统一的红代会。五大领袖所在的高校，要么两大派势均力敌，如北大、清华；要么是一派的一统天下，如北航、北地、北师大，任何别的红卫兵组织已经很难找到生存的空间。但“造反兵团”却在被公认统治最严密的北师大，在谭厚兰的眼皮底下，一日之间拉起大旗，站稳了脚跟，一直坚持到了一年后，成为毛泽东口中那一个两百人的兵团。

（二）“兵团”在北京高校群众组织中又是寿命最长的。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最后的接见之后，随着工、军宣队的进驻，所有的红卫兵组织几乎同时宣布解散，大大小小的山头顷刻间全部削平，但“造反兵团”却是个例外，它不但没有解散，反而提出了承认自

已合法身份的要求，为之又坚持了两年多，因此而被称作是北京高校的最后一个小山头。这在北京，乃至全国的红卫兵历史上都是很少见。

（三）直到1970年夏天，北京市委两次到师大分别检讨“右倾”及“严重右倾”错误后，兵团坚持要市委承认“路线错误”，市委不接受，结果又去市委门口静坐，直到市委书记吴德出面接见兵团代表后静坐结束。这应该算是北京市红卫兵最后的一次有组织行动。

（四）1971年4月26日，“造反兵团”被以“破坏51大清查”的罪名“连锅端”。79名“兵团”学生被强制送到北京郊区怀柔庙城解放军某部营房关押审查，直到几十天后，他们被送回学校，参加毕业分配为止。其间为了表示抗议，兵团还组织了绝食抗议。由于当时行动的隐秘，这段文革中罕见的事件至今只有少数人知道。谜底，却可能永远无法得知。

（五）受“造反兵团”影响，北师大成为北京高校的老大难。连累北师大69、70两届学生推迟毕业两年多。这在全国高校恐怕也绝无仅有。

（六）五大领袖之一的谭厚兰与“造反兵团”的头领王颂平，同为女性，因此在北师大出现了其它院校罕见的双“雌”对决场面。北京高校所有群众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在清查“五一六”时几乎全部被关押审查监督劳动。文革后又二次算账，被判有罪，有的还被关进监狱。前一次算账，谭厚兰和王颂平都没能幸免，但在文革后，唯一一个获得平反的就是王颂平。谭厚兰的最终结局大家都清楚了，而王颂平不但开始了正常工作和学习，而且成为有卓著贡献的人物。这在文革造反派头头中，也是为数不多的。

（七）除了王颂平，“造反兵团”的其它头目也没有一个因文革罪行而被清算。他们中不少人在今天已成为知名人物。即使在它的普通成员中，也出现过一些重量级人物。其中最为人所知的当属许嘉璐——对，没错，就是那个后来成为人大副委员长的许嘉璐。当年他只是中文系的一名普通青年教师，但确实坚定的“兵团”成员，而且有着特殊的地位。他不是总部委员，也不在系（兵团内称连队）任职，但却被所有人尊称为“许老板”。其扮演的角色类似于“军师”或“顾问”“高参”，具体指导兵团的三大喉舌“广播站”“《兵

团红旗》编辑部”“斗私批修战斗队”（兵团的理论班子）。1971年4月26日“造反兵团”被“连锅端”到怀柔军营，“许老板”虽侥幸漏网，却和王颂平（全国通缉一个月后被抓到）关在师大批斗。还有一位金宏达，文革初批《海瑞罢官》，还是一名普通学生的金宏达，以时汉人的笔名写了一篇后来被批为折衷主义的代表作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成为轰动全校的事件。很少人知道，他也是“兵团”隐秘的一支笔。文革后金宏达成为我国的第一位文学博士，历任宁夏教育厅副厅长、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北京图书馆副馆长、中国华侨出版社社长、总编辑，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知名学者专家。

举出这些例子，并不想以此证明兵团的什么，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当时北师大的人心向背，也证明了“造反兵团”绝不是谭厚兰所攻击的“大杂烩”。

（八）毛泽东在7.28讲话中，还对谭厚兰说了这样几句：“你暂时还不能走，你是女皇啊！今天到会四个（这此话时蒯大富尚未到会——笔者注），两个女的，真了不起，我看你暂时还不能走，你要给他们粮吃，出入无阻，那些人也够惨的，‘省无联’式的大杂烩，还要搞反夺权。别的学校也参加了”。有人据此认为，这是毛泽东把“兵团”定性为‘省无联’式的大杂烩，也是对“兵团”的彻底否定。对毛主席的这句话，我有完全不同的解读。这一点我打算放到最后来谈。

有人也许会问：文革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你现在翻出这些尘封的往事，是为了怀旧，还是想为兵团立传？我可以坦诚地说，我的确曾是兵团的一员，但还不至于幼稚到想以此来证明什么。我尽量客观地讲述这段往事，只因为这是北师大人不能回避的一段历史，也是其他关注文革、研究文革者应该感兴趣的一个话题。

上篇 1967年9月7日

1967年9月7日，是北师大文革历史上一个特别重要的日子。

为什么是这一天？其大背景是：8月底9月初，文革发生了一次大的政治地震，中央文革红极一时的三位核心人物王力、关锋、戚本禹被毛泽东亲自下令揪出打倒。这场地震的冲击波传到北师大，在9月7日催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谭厚兰的“井冈山公社”（以下简称“公社”）内部政变，被专政半天（在师大称之为“九七事件”），另一件是“造反兵团”宣布恢复活动。这本来是互不关联的两件事，在9月7日有过短暂的交汇，又迅速变成两条平行线，走入了不同的历史轨道。

所以，我们把两件事分开来叙述。

首先，王关戚事件为什么会引发谭厚兰北师大的次级地震，改变了谭厚兰的文革命运？这要从谭厚兰的发家史说起。

众所周知，北京有名震全国的五大领袖，都是凭造反起家的响当当人物。但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五人的造反成色却大不相同。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都是自发起来造反的，被称作自发的造反派。而两位女将则不同，她们都是由文革权势人物授意、牵线，起来造反的，聂元梓的后台是康生，而谭厚兰的直接牵线人是《红旗》的关锋和林杰。她们因此也被称作是“奉旨造反派”。其中尤以谭厚兰与关、林的关系最密、最铁，因此又被对立派讽为“有保姆的左派”。谭厚兰在文革中被广为宣传的几大功绩：第一个贴出大字报反校党委、反工作组（？——此为误传，有兴趣者可看我的另一篇文章《关于文革中谭厚兰与“北师大6.20事件”的一个误传》），震惊全国的山东曲阜讨孔，第一个到高教部夺权，在群众组织中第一个喊出打倒谭震林的口号，都无一不是出自关、林的授意和指使。而林、关也把谭厚兰当成自己的近卫军，可以任意调度使用。与中央文革大员如此亲密的关系，在北京的高校里可谓是无二。康生就曾经在北师大的群众大会上公开宣称：谭厚兰的后台是林杰，林杰的后台是关锋，关锋的后台就是我康生。现在就不难理解了，王关戚的突然倒台对谭厚兰意味着什么，说是天塌了一点都不过分。

8月31日王力、关峰被隔离，《红旗》杂志社的林杰自然也不能幸免。

9月1日，得知小道消息的北京航空学院“红旗”、北京石油学院“大庆公社”等“天派”组织，在北京师范大学校园里贴出“打倒林杰”“谭厚兰必须悬崖勒马”等大幅标语。尚不知情由的“公社”立即予以反击，于9月1日发表《关于目前形势的严正声明》，称：“反对林杰、关锋就是分裂中央文革小组！”当晚谭厚兰召开师大革委会会议，她在会上一口咬定“林杰是坚定的革命左派”。会后，谭厚兰亲自带队率“公社”人马到《红旗》杂志社游行示威，表示支持林杰。

9月3日，林杰已垮台消息被证实，谭厚兰失声痛哭，说：“这样一来，全国的造反派被压下去，文化大革命就会被葬送。”

9月4日，谭厚兰召开全校大会，以狠抓大批判为名，鼓动大家去《红旗》杂志社游行示威。当天，周恩来和中央文革负责人接见北京高校红代会负责人，通报了中央文革成员、《红旗》编辑部工作人员林杰等人被隔离审查的消息。当晚，仍不死心的谭厚兰犹如热锅上的蚂蚁，又女扮男装，夜闯《红旗》杂志社，希望和林杰取得联系，了解情况。

9月7日早晨，北师大井冈山广播站突然播出通告，师大革委会常委樊立跃、黄家林、李五全等人宣布成立“专政委员会”，接管北师大革委会。紧接着他们在“7·27广场”召开大会，会上再次宣读了上述通告，并把谭厚兰押上主席台进行批斗。大会实况通过广播传遍全校。谭厚兰的一些亲密战友纷纷“如梦初醒”，反戈一击，上台揭发批判谭厚兰的罪行。一些下属组织则争相发布声明，宣布退出井冈山。谭厚兰在师大的看似铁桶江山，顷刻间近于坍塌。

几乎与此同时，北师大校园里又爆响了另一颗炸弹：井冈山造反兵团宣布自即日起正式恢复活动。现在我们就把话题转向“兵团”。

很多人以为“北师大造反兵团”是成立于1967年9月7日，其实不是，它只是在这一天宣布恢复活动。

1966年10月，“公社”内部出现第一次分裂。部分曾与谭厚兰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的“公社”早期造反派，与谭厚兰发生严重分歧，决定退出井冈山，这些人多数成了后来“兵

团”的核心成员。1967年1月，他们以王颂平为首成立“斗陶兵团”，26日，又公开宣布成立以“斗陶兵团”为核心的“北师大井冈山造反兵团”（此说有误，“北师大井冈山造反兵团”成立于1967年1月25日，同年3月12日宣布“被迫解散”。“斗陶兵团”成立于这之后的1967年5月。以下所述几处时间也有小的出入——方注）。事先得到风声的林杰曾极力加以阻拦，却未被买账。但是“造反兵团”出生的时机实在不好。由于得到后台关峰、林杰的面传心授，谭厚兰在北京市和高教部的夺权中都抢得先机，立下大功，接着在3月7日又抢先喊出“打倒谭震林”的口号，打响了公开反击“二月逆流”的第一枪，一时间成了文革造反炙手可热的人物、中央文革的宠儿和样板，其势头几乎压倒了聂元梓！刚刚成立、立脚不稳、羽翼未丰的“造反兵团”如何能同其对抗呢？于是，在谭厚兰的打压围剿之下，“造反兵团”在3月11日自行宣布“被迫解散”。可怜造反兵团只存在了短短的42天，便中途夭折了。

但“造反兵团”的“被迫解散”其实只是暂时停止公开活动，它的核心人物一直在暗中寻找合适的机会东山再起。随着谭厚兰基本上完成了校内的统一，有红代会和市革委以及背后“王关戚”的直接支持，北师大已成为她的独立王国，“造反兵团”的复活希望也越来越渺茫。然而，机会总是等待那些有准备的人。就在所有人都认为最不可能的时候，王关戚事件发生，一个天赐良机突然降临。

9月2日，“天派”各校代表在矿院举行会议，师大王颂平派代表参加，介绍了师大情况。会议讨论了如何利用这一时机整垮师大“公社”和谭厚兰。会上散发了师大“造反兵团”恢复活动的声明。傍晚，蒯大富、韩爱晶来到北师大看大字报，用钢笔在一份大字报上写到：“坚决支持真正的‘井冈山’人。”

当夜，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等组织在矿院开会，由北师大王颂平、铁崇光介绍谭厚兰保林杰的情况。会上决定于9月7日在师大召开庆祝师大“造反兵团”恢复活动大会。

9月5日晚，王颂平主持“兵团”会议，决定恢复“井冈山造反兵团”，召开恢复庆祝大会，邀请“天派”参加。

9月6日晚，蒯大富、韩爱晶以及体院、轻工、矿院、机械学院许多高校“天派”头头在北航开会，“兵团”王颂平、铁崇光，师大革委会常委樊立跃、黄家林也参加了会议。蒯大富、韩爱晶宣布：9月7日在师大召开“庆祝造反兵团恢复活动大会”，“天派”各校要尽量多派人参加大会。会后，铁崇光与黄家林等初步商定在9月7日互相呼应，配合行动。

在9月7日樊立跃主持的“7.27广场”大会上，铁崇光等兵团代表也坐在主席台上，但成立“专政委员会”和批斗谭厚兰，却是“造反兵团”事先没有料到的，感到这一突发情况和过激行为脱离了原定轨道，开始变得迟疑。韩爱晶、蒯大富也认为成立专政委员会和批斗谭厚兰是严重的失策，对王颂平建议：“千万别和‘专政委员会’搞在一起。”于是，大会上“兵团”代表表示：“是否参加专政委员会，未定。”兵团决定另行组织“庆祝井冈山造反兵团恢复活动大会”，与“专政委员会”刻意拉开了距离（事后证明，这是一个决定兵团命运的英明决策）。

10时左右，“天派”上万人来到北师大“7·27广场”，参加“打倒林杰，彻底摧毁5·16兵团誓师大会”和庆祝“井冈山造反兵团”恢复活动的大会。蒯大富亲自带领清华大学“团派”大批群众前来参加，“团派”头头鲍长康在会上发言支持“井冈山造反兵团”。

面对这一排山倒海而来的洪流，校广播站的高音喇叭中，一个接一个的播放师大“井冈山”几十个战斗队宣布集体加入“造反兵团”的声明。还有更多的人的人纷纷来到恢复活动后的“井冈山造反兵团”，排队领取加入“兵团”的申请表格。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文革的风向更是瞬息万变。

下午，形势急转直下。中央文革小组派人到师大传达紧急指示：“中央文革小组坚决反对开群众大会斗争谭厚兰，反对搞垮师大革命委员会。谭厚兰和师大革命派在二、三月

份反对谭震林、批判谭震林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支持他们的这种行动，你们应当立即释放谭厚兰同志，希望你们严格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路线，提高革命警惕性。”

北京市革委会也于当天发布了通告：“1、北师大今天在个别别有用心的人的操纵下，推翻师大革委会，非法绑架和斗争谭厚兰与师大革命委员会委员，这些作法都是完全非法的，都是违反中央《六六通令》的，完全违反中央负责同志最近的讲话精神。现宣布无效。应立即恢复师大革命委员会的一切权力。2、樊立跃等人自己组织的‘专政委员会’是非法的，应立即宣布解散。3、樊立跃、黄家林、李五全三人拘留审查。”

地派组织也趁机展开反击，大队人马不断来到师大，声援谭厚兰。

急剧转变的形势使卷入漩涡的各方都面临巨大的考验。

樊、黄、李进监狱，专政委员会只存在半天就寿终正寝。这就无需再提了。

谭厚兰又重新执掌北师大革委会的权力，这天晚上，重获自由的谭厚兰在“7·27广场”召开大会，表示拥护中央文革紧急指示、北京市革委会通告，并声讨“专政委员会”的罪行。谭厚兰当然不忘把矛头直指“兵团”，一口气给他们扣上了“一月风暴反夺权的逆障”“二月逆流的怪胎”“颠覆红色政权的急先锋”“专政委员会的罪恶帮凶”，是“一伙反革命小爬虫、变色龙”等好几顶大帽子。但她明白，中央文革对自己的挽救只是从大局出发，在王关戚、林杰问题上已铸成大错，成为自己永远的死穴。她还明白，她一直引以自豪的井冈山，竟是如此地不堪一击，在自己被专政的半天多里，不但没有一个人、一张大字报保她，相反，她的那些亲密战友，包括她视若亲人的贴身秘书都起来揭发她。她更明白，内部的反对派被镇压下去了，但她一直视为心腹大患的“兵团”却乘乱而起，而惊魂甫定的她，却回天无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兵团”坐大，成为她永远的噩梦。

兵团在经历了一天的大喜大悲之后，也在认真思索。他们庆幸在关键时刻作出了正确决策，没有把自己和樊、黄、李绑在一起。还庆幸中央文革和市革委的严厉通告中并没有一个字涉及自己——可以想象，如果反之，就等于判了死刑，兵团也就只能再次宣布被迫解散了。还有一件事相当重要：王颂平也参加了当晚江青等人在人民大会堂对首都红代会

代表的接见（此说不确。王颂平参加接见的日期是1968年3月5日，中央文革接见首都高校学习班代表，师大双方都有参加——方注），据说江青一见面就劈头盖脑的说：“你就是王颂平！我可认识你了！我今天不和你说话！”“公社”幸灾乐祸地渲染这是江青对王颂平的斥骂，而兵团却从江青的话中看到了希望：因为江青说的是“我可认识你了！我今天不和你说话！”那么明天呢？今后呢？如果江青讲的是“我不想认识你，永远不想见你！”甚或公开将她轰走，那就完全不同了。于是，兵团反而从江青的斥责中读到了一丝宽容。经过全面分析，兵团的头头们得出的结论是相当乐观的，也坚定了存在下去的决心和信心。

以韩爱晶、蒯大富为首的“天派”，虽然没能实现彻底整垮谭厚兰的目标，但仍然给她和“地派”以重创。更重要的是，他们支持的“兵团”终于站住了脚，成为插入谭厚兰心脏的一把钢刀。当然，他们也不得不暂时有所收敛，因为就在当晚，江青对“天派”的几个头头骂道：“你们是蠢木头，败家子，叫你们不要管人家的事，你们偏要去，结果出了乱子，上了坏人的当……你们要进行检查。”

三十多年后，蒯大富在一个访谈中这样回忆：1967年9月7号，我和韩爱晶策划搞了一个“9.7事件”。谭厚兰他们学校有一个北师大革命造反公社（实为造反兵团——编者注），头头也是个女的，姓王，是谭厚兰的对立面。现在我都记不清楚他们两边有什么政治上的不同见解或者反对谁、保谁。那天，我们就拉来好多人支持北师大革命造反公社（兵团），全校到处都造反，然后就是把谭厚兰的革委会给冲垮了。结果，当天江青、陈伯达就接见我们，把我和韩爱晶臭骂一顿，说我们俩不听话，胡搞，骂得非常厉害。我们吓坏了，从北师大撤出来了。结果，谭厚兰的权威又恢复起来了。

1967年的9月7日，在北师大乃至整个文革历史上注定了是不平常的一天。对谭厚兰，这无疑是一场“劫”，是她后台王关戚倒台带来的必然结果；对造反兵团，则是一个难得的“运”，同样是由“王关戚事件”带来的幸运。它应运而生，从此师大走向了分裂，弄得谭厚兰再也睡不着觉。

中篇 1967 年 9 月—1968 年 8 月

9 月 7 日过去了，师大的统一也一去不复返，进入了同在井冈山名号下的“公社”与“兵团”之间的“不对称”斗争。双方的实力对比实在悬殊。

先看两位女主帅：谭厚兰年届 30，名义上也是学生，但实为调干，入学前已经在职、入党，文革前夕正在《红旗》实习，文革爆发后则成为著名造反派，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首都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委会常委。

反观兵团的王颂平，只是一个大二的普通女生，自发造反派，无政治背景、无中央文革恩赐的光环、无头衔的“三无”人员。两人的较量，在一些人看来，输赢似乎应无悬念。

再看他们各自的队伍：谭厚兰的“公社”拥有几千人马，拥有运营一年以上的严密组织机构和一批久经战阵的兵将，掌握着全校的全部权力和资源，有红代会、市革委和中央文革的官方认证，有“地派”这样强力的外援，这使得他们在气势上已处于上风。反观兵团，成立不过几天，人马不过几百，组织尚不健全，一切都在草创，没有任何政治物质资源，也没有像样的宣传工具，更重要的是根本没有得到文革官方的承认，在红代会的名册上是个道地的黑户。名义上，它属于“天派”，但在遭到江青的训斥之后，蒯大富和韩爱晶的天派也不敢公开表示支持（但暗中的支持还是有的）。如此悬殊的力量对比，让很多人都怀疑“兵团的旗帜还能打多久？”但“兵团”能顽强地坚持下来，自也有它的道理。因为在双方的力量对比上，还有另外一种计算的方法：

谭厚兰固然握有雄厚的政治资本，但因当权时间长，犯错误多，树敌多，加上蒯大富形容的“有些霸道”，负面财产也更多一些，第一个就是王关戚问题，是她永远难以洗清的污点，永远被对手揪住不放的软肋。第二个是反击二月逆流，这本来被看作是谭厚兰的一大功绩，但因为犯了造反派“怀疑一切，一反到底”的通病，谭厚兰和“地派”的反二月逆流也反过了头，潜藏着一股把矛头暗中指向总理的暗流。1967 年 6 月，北京出现的反

总理的“516兵团”就有地派的背景。很快，“516兵团”被中央文革宣布为反革命组织，谭厚兰和地派连忙急刹车，约束部下停止暗中整总理的材料，极力摆脱干系，但仍留下了许多蛛丝马迹，成为对手的又一攻击点。反观兵团，作为新生的“在野派”，势单力薄固然是一大劣势，但其干净的历史和清新的作风在气势上并不输与对方。

谭厚兰的“公社”，表面上人多马壮，内部却四分五裂，派系林立。例如每个系只能有一个大队，但中文系却是例外，“中文系大队”之外另有一个“挺进大队”，两者间势同水火。再如物理系，有一个大名鼎鼎的李庆林，曾是早期造反兵团的头头之一，但在“兵团”恢复活动之后，却选择了留在井冈山，单独统率一支人马，基本不听谭厚兰的指挥，暗中与“兵团”互通款曲，随时准备拉队伍走人另立山头。当然最有说服力的例子还是“9.7事件”，看是铁板一块的“公社”顷刻间分崩离析，谭厚兰身边的亲密战友，大难临头各自飞，甚至不忘对倒在地上的谭厚兰踩上一脚。反观兵团，人数虽少，却相对团结，如同一切创业期的队伍一样，没有大的利益之争，没有派系，没有山头，如果说有矛盾，主要是观念和策略之争，绝对不丧元气。兵团的领导，以一年来共同斗争的战友为主，兵团的群众，经过“9.7事件”的大浪淘沙，剩下的都是比较坚定的分子，在谭厚兰的高压下反而更加抱团，斗志旺盛。另外，兵团在校内还有大量的暗中支持者和同情者，他们因各种原因没有正式加入，但却经常与兵团配合行动，通风报信。从这个角度讲，“公社”与“兵团”的实力对比，绝不是人数上反映出的10比1。

从1967年9月兵团恢复活动，到1968年谭厚兰的井冈山公社正式解散，两者间的斗争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967年9月-1968年2月，文攻阶段

以1967年9月7日为起点，“公社”与“兵团”立刻进入了激烈的对博。兵团把“公开保王关戚”和“暗中反总理”作为攻击点，力图证明谭厚兰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把求合法，求生存，求平等作为首要目标。“公社”则早已由谭厚兰定下基调，“兵团”是“一月风暴反夺权的逆障”“二月逆流的怪胎”“颠覆红色政权的急先锋”“专政

委员会的罪恶帮凶”，是“一伙反革命小爬虫、变色龙”。其目标当然必须彻底消灭，斩草除根。这注定了双方的斗争是一场生死之战，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

但双方的斗争方式基本没有脱离文革“四大”的轨道，没有滑向武斗。在兵团，没有这样的可能，在公社，这可能是出于过度的自信认为无此必要。

但谭厚兰显然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兵团不但没有迅速垮台，反而很快站稳了脚跟。在短短的时间内，他们迅速建立起几百人的队伍，建立完善了机构编制，还抢占了校内一座闲置的楼房——工五楼，作为自己的大本营，建立了自己的广播站（顺便说一下，由蒯大富赠送的广播器材，投向兵团的几位原校广播站最出色的播音员，使得兵团广播站的实力一点也不比“公社”逊色），出版了自己的小报《兵团红旗》，俨然已经是一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正规组织。而谭厚兰的封锁更是难以奏效，兵团不但与“天派”的众多组织保持或明或暗的联系，也不放过一切机会，挤进红代会的各种活动，大力发声，宣传自己的存在。这种策略虽然不能马上奏效，但累积效应却渐渐显现。

在校内，“兵团”几乎不放过任何与谭厚兰对抗的机会。除了大字报、大标语、大喇叭、大辩论、和兵团小报，凡全校性的集会，他们总是不请自到。常见的场景是，“公社”刚刚宣布开会，就会有数名兵团战士冲上讲台。要求发言，甚至强行抢夺麦克风，大呼口号。会场乱成一团，议程无法进行，只好匆匆宣布散会。

应该说“兵团”的这种策略还是很有效的，兵团很快地成为北京人所尽知的谭厚兰对立派：天派看到谭厚兰的狼狈相暗自窃喜，地派则眼见自己的两大“领头羊”之一变成了“跛脚羊”而难抑焦虑。市革委、中央文革虽继续秉持不承认的态度，但也难以视而不见。

文革中的“文斗”当然不会文质彬彬。随着战情的变化，有时也难免出现激烈行为，甚至滑到武斗的边缘。我记忆中就有这样印象深刻的两次：

第一个是“喇叭事件”。谭厚兰为了压制兵团广播站的声音，利用雄厚的财力增设了几十个高音大喇叭，一下子把嗓门提高了几百分贝。“造反兵团”不甘示弱，在一个夜间策划了一次奇袭，派出内部戏称的“武工队”，把对方的一部分大喇叭摘走，其余的全部

接到自己广播线上。第二天清早，从睡梦中醒来的师大人，突然发现“公社”的喇叭集体失语，而兵团的声音却猛然高了八度，一时间还以为又发生了第二次“9.7”事件，待明白过来，谭厚兰自然气得发疯，但因为没有抓住真脏实据，除了把“错位”的喇叭线重新接回，被摘走的只能当是“白送”，自认吃了个哑巴亏。那些小老百姓，则如同看了一场不花钱的电影，捂着嘴偷偷地乐。

另一件是“主楼静坐事件”。起因是1968年1月，66届毕业生在推迟一年半之后开始分配。兵团担心自己的应届毕业生吃亏，要求参与毕业分配工作，遭到谭厚兰拒绝。“兵团”在屡争未果的情况下，决定在校革委会所在的主楼一楼举行静坐，期间还进行了绝食抗争。谭厚兰拒不让步，“兵团”也不肯妥协。事件一直持续了四十多天，直到1968年3月，中央文革在钓鱼台举办高校群众组织大联合学习班，其间两次接见了各高校群众组织负责人，破天荒地允许“兵团”参加，这在兵团方面看来是个重大进展。同时毕业分配进入尾声，“兵团”成员未感到明显歧视，遂决定结束静坐。

获准参加高校群众组织大联合学习班，是兵团距离被公开承认最近的一次。但在大好形势下，兵团也犯下了大错，遭至谭厚兰的大举反攻。双方的斗争开始向武斗潭边演变。

第二阶段：1968年3月-7月，武斗阶段

1968年3月，文革再次发生政治大地震。3月24日，毛泽东亲自批准，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突然被宣布打倒。杨成武、傅崇碧德的罪状之一是“在北京市反对谢富治、想夺市革委会的权”，这显然是指几天前刚刚发生的“倒谢事件”。1967年4月20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谢富治出任北京市革委会主任，与红卫兵五大领袖中作为副主任的聂元梓和作为常委的其他四人有更多的交集，因之也与他们结下众多恩怨。谢富治一向是紧跟文革小组的，对五人的态度也大抵如此。表面上看，谢富治一直表白在北京市对“天派”“地派”、对五大领袖一碗水端平，实际上更倾向于“地派”。他和聂元梓的矛盾尤为尖锐，这里可能有谢富治的偏心，也可能有聂元梓本身的问题。矛盾的起始应该是反击二月逆流和接着的高教部夺权，得到王、关、戚支持的谭厚兰，处处压聂元梓一头，聂元梓认

为谢富治偏袒谭厚兰，对其开始不满。后来，由于聂元梓与谭厚兰和“地派”的冲突不断，王、关、戚对谭的偏袒越来越露骨，很多事都由同他们钩在一起的谢富治出面，聂元梓同谢富治的矛盾更加直接。1968年3月中旬，在北大出现了炮轰谢富治事件，并很快形成了连锁反应。天派的一些组织和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纷纷贴出炮轰谢富治的大标语，还有一批学生到公安部去，要揪谢富治。形势十分混乱，小道消息满天飞，一股炮打谢富治的潮流开始形成。3月16日北京师范大学造反兵团贴出公开点名批判谢富治的大字报《谢富治、戚本禹12·27讲话必须全盘否定，彻底批判》，广播站也播出充满杀气文章《把镇压群众运动的侏子手谢富治押上历史的断头台》，并贴出一些大标语和大字报，积极参与了“倒谢事件”。但“倒谢事件”很快即被中央文革小组出面制止。3月24日揪出“杨、余、傅”，更与“倒谢事件”挂上钩。中央保谢的明确态度，让聂元梓等陷入被动，地派趁机反击。3月25日下午，北京七所院校的“地派”组织冲进北大，发生了“3.25”武斗事件，进而引发北大校内两派的武斗。

“倒谢事件”让“兵团”陷入非常被动的境地。谭厚兰岂能放过这一天赐良机，立刻动员一切力量，对“兵团”展开大规模围剿。“兵团”也森严壁垒，众志成城，准备迎战。由此，师大进入了延续百余日的“武斗阶段”。

作为战前动员，谭厚兰首先抓住“倒谢”与“杨余傅”的关系，利用大字报、大标语、大喇叭等一切舆论工具，高调声讨“兵团”犯下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方向路线错误，是“杨余傅”的小爬虫。半年前，“兵团”曾给谭厚兰加以类似罪名，只是当年的“王关戚”换成了如今的“杨余傅”被反用了回来，同样的罪名，出自当权者之口，分量自是大不一样。谭厚兰已不满足于用文攻手段，兵团头目被点名“通缉”，很多兵团成员被围追堵截，名曰“辩论”，实为围攻。一些被抓住“倒谢”把柄的兵团成员被公开批斗，诬为现行反革命。数学系一个名叫王守田的学生被扭断了一只胳膊，仍然押送游街。兵团广播站那篇“断头台”文章的作者、政教系学生李清宝被迫东躲西藏。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师大校园笼罩着肃杀气氛。兵团不得不转入守势，一面表示“坚决拥护伟大领袖的战略部

署”，一面暗中做好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恶斗。一些重要的部门，特别是广播站，都转移到了兵团的大本营工五楼（此说不确，广播站本来就在工五楼——方注），还有不少兵团成员，主动搬到工五楼，据守阵地，进入临战状态。

4月21日（这可能是第一次围工五楼的时间，下文中说到的攻楼应该是当年的7月12日——方注），经过紧密策划的“公社”调动了上千人马，由谭厚兰的副手董连猛亲自指挥，喊出了“踏平工五楼”的口号。随即把队伍开到工五楼前。他们首先在楼前喊话，模仿电影里的对敌攻心、交待政策、严厉警告之类。早有准备的“兵团”则据楼顽抗，回以高呼口号、高唱语录歌和劝告谭厚兰必须悬崖勒马的反宣传。见到“兵团”如此冥顽不化，董连猛立刻下达了对工五楼的攻击令。

这里要简单介绍一下后来变得十分著名的“工五楼”。“工五楼”是师大“工”字编号的五座职工楼中的一座。当时不知因何处于闲置状态。1967年9月“兵团”恢复活动后，占为己用，成为兵团的大本营。楼为四层三门，隔为若干单元，狭窄的楼梯成为进入楼内的唯一通道。在没有热兵器的条件下，这显然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堡垒。

且说随着董连猛的口令，一帮膀大腰圆的男生领头呼啸着冲进楼门，却发现所有的楼梯都被桌椅板凳堵得严严实实，真个是森严壁垒！壁垒后面则站着众志成城的兵团男士，随时准备对敢于来犯之敌，居高临下，给予痛击！进攻者欲入无门，欲攻乏术，光棍不吃眼前亏，只好暂时退出。董连猛和手下一番计议之后，决定改强攻为围攻，队伍暂时后撤，门前布下岗哨，许出不许进。入夜，董连猛亲自出马，祭出狠招。他们登上与工五楼成丁字形的工三楼楼顶，架设起用汽车轮胎制作的强有力大弹弓，将大石块对着工五楼的玻璃窗一阵猛射，没过多久，工五楼朝东的许多玻璃窗都被击碎。

在兵团的历史上，这大概是最困难最黑暗的一段日子。工五楼黑云压城，随时有被攻破的危险。兵团领导设想到了最坏的结果，甚至将一小支队伍撤往同为天派的北京轻工学院“红鹰”的地盘，准备一旦工五楼沦陷，建立“流亡政府”。

兵团那些留在工五楼外面的人日子也并不好过，“公社‘对他们使出了交替的两手：软的一手，不断有人围追辩论、做说服劝降工作，动员弃暗投明，退出兵团；硬的一手，时不时就会被截在路上或饭厅门口，一顿暴揍。当时有两个体育系学生，经常对兵团人大打出手，并且专找要害部位下手，被兵团骂作“白狗熊”“黑狗熊”。食堂里有一位姓杜师傅，特别仇视兵团，见到兵团的人来打饭，态度极为恶劣，有时还拳打脚踢（此人后来因此被追究，受到惩处）。

谭厚兰对工五楼的包围前后持续了近百天，中间时紧时松，时战时停。其中最激烈的有两个时段：一次是从“四二一”第一次围楼后的十几天。第二次是6月，这次的攻击更加猛烈，特别是使用了对工五楼断水断电断粮的“三断”政策。但兵团的抵抗也更为坚决，他们以蜡烛代电灯，依靠深夜偷偷运进的和窗外的战友扔进的食物充饥，更绝的是居然用了十几昼夜，在楼内打出了一口水井。谭厚兰想困死“兵团”的图谋又一次没能得逞。

7月28日，为制止北京高校的武斗，毛主席接见了包括谭厚兰在内的五大领袖，向各校派出了工、军宣队。北京高校的武斗戛然而止，北师大工五楼的攻防战也相应结束。

下篇 1968年8月—1971年7月

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最后的接见之后，随着工、军宣队的进驻，北京高校的所有的红卫兵组织几乎同时宣布解散，大大小小的山头顷刻间全部削平。但“造反兵团”却逆向而动，不但没有宣布解散，反而提出了承认自己合法身份、进入校革委会、批判谭厚兰的错误等“不识时务”的要求。

谭厚兰的“公社”宣布解散后，实际仍掌控着校革委会的大权，和刚刚开进学校的工、军宣队一道对师大实行共治。“兵团”则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校革委会根本不承认它是一个合法的群众组织，工、军宣队则强力压它先解散，再谈其它。兵团则清醒地看到，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一旦解散，一年来的斗争将付之流水，所有的成员将成为谭厚兰的案头鱼肉，任其宰割，所以坚持要先承认，后解散。

8月，67届毕业生分配工作。几个月后，68届毕业生分配工作。随着67、68届毕业生陆续离校（部分人被延迟分配），谭厚兰这位本应是66届的超龄毕业生，也离开了她的昔日王国，被分到北京军区某部一座农场劳动。几乎与之同时，1968年底，五大领袖中的聂元梓接受劳动改造，蒯大富被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任技术员，韩爱晶被羁押审查，交待问题，1969年11月被分配到湖南株洲三三一厂。王大宾分配到成都探矿机械厂工作（从1970年起，他们又陆续被召回学校，以“清查516”的名义被隔离审查，实则对他们文革中犯下的罪过进行清算，此是后话）。工、军宣队代替谭厚兰成了北师大的实际掌权人。留下的69、70两届学生被要求重新恢复以系、班为单位活动，工军宣队队员则分派至系乃至班，组织大联合、大批判。王颂平因为是69届，留在学校。此时，在兵团内部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有人主张响应毛主席的指示，让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宣布退出兵团，回归班级。个别人还反戈一击，公开反对王颂平（这几个人后来被兵团称为叛徒）。在兵团的核心人物中意见也并不统一，有人从惯有的造反思维出发，态度偏激，主张用对抗手段逼迫工军宣队支持自己的主张，对谭厚兰进行否定批判；另一部分人则持温和态度，认为派工军宣队是最高统帅的决策，应该在支持和配合的前提下提出合理诉求，反对动辄就冲会场、贴大字报等过激手段。但在当时的形势下，很多人充斥着焦躁情绪，往往激进的主张占到上风。1970年，他们公开批评工军宣队进学校后支持井冈山、革委会，执行了“右倾”路线，并把矛头暗中指向了市革委会。其间，北京市委两次到师大分别检讨“右倾”及“严重右倾”错误，兵团却坚持要市委承认“路线错误”，市委不接受，结果又去市委门口静坐，逼迫市委书记吴德出面接见兵团代表后才结束静坐。

1970年3月中央发出“清查516”的通知。6月，谭厚兰被召回学校隔离审查。工军宣队不得不暂时改变压制兵团的态度，在讲话中不指名地承认“在北师大有一支一直坚持与王关戚做斗争的力量”，在批判谭厚兰的大会上主动让兵团参加并安排王颂平发言。

然而在批什么、如何批等问题上，兵团又同工军宣队发生严重分歧，于是，失去耐心的工军宣队决定撇开兵团单独搞“清查 516”并批斗谭厚兰。兵团则有人主张“不能让他们假批判的阴谋得逞”，于是就去冲击军、工宣队组织的批斗会。

兵团这种不讲策略的激进做法终于招致一场灾难。1971 年，王颂平等兵团头目被加以反康老、反谢等罪名成了“清查 516”的对象，兵团被扣上了“破坏 51 大清查”的帽子。

1971 年 4 月 26 日凌晨，10 多辆军用卡车载送上百名男女警察（另一说是卫戍区部队战士）进入师大，在中南楼学生宿舍，敲门抓走在梦中醒来的 79 名兵团学生，连夜送到怀柔庙城解放军某部营房。名义上是办学习班，实则为关押审查。不明真相的兵团学生在怀柔组织了数天的绝食抗议，直到主办方说明这不是逮捕、不是关押、只是用办学习班的形式帮助提高认识，才结束抗议，表示了一定程度的配合。这可能算是兵团历史上最后的一次有组织的集体活动。这距离北京高校的其它组织集体解散已过去了两年半。由于当时行动的隐秘，这段文革中罕见的事件至今只有少数人知道。谜底，却可能永远无法得知。

在 4 月 26 日这天没有被抓到的王颂平，以及前面提到过的“许老板”许嘉璐，还有数名工人、教师，则被关在师大批斗。王颂平针对所谓兵团“反康老”的指控，在此期间曾直接给康生写了封信，大意是：如果你真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你不会因为对你怀疑错了，而将怀疑你的人打成反革命。但兵团作为一个组织的终结已无可挽回。

北京其他高校的最后两届毕业生 69 届、70 届都在 1970 年年底前分配完毕，但北师大却推迟了近两年，直到 1972 年夏天。随着所有学生离校，北师大“兵团”与“公社”的斗争，谭厚兰与王颂平的对决都暂告结束。谭厚兰从 1970 年 6 月起被审查清算批判，直到 1975 年 8 月审查结束，被送到北京维尼纶厂监督劳动。王颂平则在稍晚的 1971 年被关押，同样遭到大会小会批斗，后开除团籍、学籍，遣送到北京远郊区密云县劳改(后改为到北京清河绒毯厂劳改)，长达 8 年之久。

有人据此认为，兵团和公社、谭与王是殊途同归。如果仅看到文革结束，这话也许有点道理，但是，从文革后拨乱反正的历史来看，两者的结局却有天壤之别。这也许可以从反面说明“兵团”与“公社”有本质差别。

文革结束后，北京高校几乎所有群众组织的主要负责人都被与“四人帮”挂钩，文革清算，有的还判刑入狱，而北师大造反兵团的王颂平却罕见地逆向获得平反，和谭厚兰走上了不同归宿。1978年4月，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了谭厚兰。1981年，谭厚兰检查出患有宫颈癌，被保外就医。9月，获准回老家湘潭治病。1982年6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做出了对谭厚兰免于起诉的决定。1982年11月，谭厚兰走完了人生的最后路程。这年，她45岁，终身未婚。

王颂平终于在三中全会后的1979年4月平反，当时王要求除了给她个人平反，同时也要给所有受她牵连的同学平反，还要给兵团这个组织平反。前两条实现了，对于给组织平反的回答是：不要再追下去了。

在距离正常毕业分配10多年后，她进入了当时政审很严的隶属于公安部的国际政治学院(现称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据说党委会讨论她的接收问题时有人反对，理由是她是文革中的“造反派”。院长凌云搬出彭真委员长的话：“有人说王颂平是造反派，第一，造反是毛主席号召的，我们这么多老干部当时都弄不明白，何况一个青年学生？第二，说造反还要看她反的是谁？”谁都知道，康生是彭真的死对头。于是一锤定音，王颂平进了该院。在兢兢业业工作了10年之后，从副系主任的岗位上辞职，与丈夫方延曦（同班同学，兵团战友，文革中同样因受迫害被迟至1979年才获平反，重新分配工作）一起选择自主创业。1994年，发明笔顺码中文输入法，1998年4月发明笔顺码专用键盘，创办北京必胜电脑有限公司，任董事长。后又关注幼儿教育，创办《聪明娃娃金钥匙》幼儿教育平台，并兼任北师大继续教育学院兼职教授。如今，她已是一名卓有成绩的专家学者和社会活动家。

结束语

写到这里，这篇文章本该结束了，但还有两个问题必须回答。

问题一：如何解读毛泽东说的“省无联”式的大杂烩？

首先必须对毛主席的这次非常接见有一个深刻认识。红卫兵和五大领袖都是毛泽东亲手制造和扶植起来的，为文革立下了大功。现在同样出于文革的需要，要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再把他们踢出历史舞台，文革中善于翻云覆雨的毛泽东也感到是一个为难之事，因此他老人家为这次接见定下的基调是扮演一个慈父的角色，对五大领袖既严厉批评，又尽量安抚，一再表示“你们这五大将，我们都是护你们的。”

五大领袖一定也都预感到此次接见的严重性，十分不安和恐惧。蒯大富在工宣队冲进学校后，一直认为这是一个背着毛主席的阴谋，于是采取武力对抗。失败后仓皇逃走，接到毛要接见的通知后，仍不敢相信，不敢前来。凌晨七点，蒯大富狼狈地赶到毛主席的会见地，一头扑到毛泽东怀里，嚎啕大哭，说：主席，今天早上，肯定是“杨余傅”黑手干的，派了十万工人把我们清华完全包围起来了，进了各楼分割包围，把我们人抓走了好多，又打了。主席就把双手平伸出来，上下翻了一下，说：你要抓黑手啊，黑手就是我，工人是我派的。

蒯大富说：主席，那不可能！您平时制止武斗的时候就是把双方隔开，是不带枪、不开枪、不打人、不骂人、不动气，“五不”嘛，这我都记得。可他们进学校就分割包围，一包围就抓人，就打人。当时，主席冲着谢富治、温玉成就喊：唉，谁叫你们抓人啦？谁叫你们打人啊？谁被抓走了？统统放了，一个都不能留。

在会见临近结束时，蒯大富说出了五大领袖的共同疑惑：“主席，你是不是不要我们了？”毛的回答是：“我把你们找来是护着你们的。”

为了体现“是护你们的”，毛泽东对于五大领袖的校内两派斗争一再表示：“我也是偏向你们这一边，你们回去一讲，我们有偏向，井冈山、四一四兵团，就会对我有意见。

清华四一四说四一四思潮必胜，我就不高兴。”对已获承认，占有半壁江山的对立派尚且如此，更何况是小小兵团？当着谭厚兰面加以贬抑，不是很容易理解吗？

了解了这个大背景，我们再来分析：毛泽东为什么说出“‘省无联’式的大杂烩？”

我的解读是：谭厚兰一贯攻击“兵团”思想异端“，是“大杂烩”。而“省无联”式的大杂烩就是她向上告状时经常扣给“兵团”的大帽子。毛泽东为了安抚和“护着”谭厚兰，顺口重复了一下谭厚兰的说法，如此而已。因为，从下面的分析不难看出，“兵团与省无联”式的大杂烩绝无任何相似之处，而后来的事态发展也证明，毛的这句话也只是说说而已，并没有产生任何的实际作用。

现在介绍一下什么是“省无联”式的大杂烩。这里有两个关键词：“省无联”和“大杂烩”。当年“省无联”的标签之一就是大杂烩，所以，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说法的来历。

“省无联”的全称是“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是文革中一个在全国都有很大名气的群众造反组织，它曾引起毛及中央的注意，最终被定性为“反革命大杂烩”组织，予以摧毁（文革后平反）。这至今仍是研究文革历史的学者所重视的一个课题。

其实，“省无联”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组织，而只是长沙市当时两大派之一的“湘派”系统联席会议式的松散结合，各行各业，大大小小，各种持“湘派”观点的组织都可以随意进出，自行其是。它并没有统一的机构和章程，有限的几次共同行动，也相当随意、随机，有时甚至在一个组织内也纷争不断。所以，常被对立的一派攻击为“大杂烩”，中央文革对它最初的批评也主要是“不能建立跨行业组织。”

在湖南的两派矛盾中，中央文革起初持中立态度，将“省无联”问题视为湖南造反派组织之间的派性之争，“省无联”仍是派性的群众组织，解决湖南问题的基调是尽力促成两者大联合。但到了1968年元月中下旬，中央的态度发生急剧转变，对“省无联”做出异常严厉的批判。到1月24日、26日、2月1日，中央三次接见湖南省负责人，更是严厉地宣判了“省无联”组织的死刑，将整个“省无联”组织定义为“反革命的大杂烩”。

导致中央对“省无联”态度的严厉急变的原因，是因为几个大中学生写的几张大字报。

毛泽东的老家湖南，历来是革命者辈出、新思潮泛滥之地。当时在长沙就有这样的一些“极左派”红卫兵，他们不怎么关心两派斗争，反而热衷于探讨文革理论，撰写涉及国家命运的理论文章。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中学生杨曦光（即现代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的《中国向何处去？》，大学生张玉纲的《我们的纲领》等。其实在热衷于派性斗争的两大派中，并没有几个人关注这些所谓的理论文章，他们本人也只是所在的属于“省无联”的红卫兵小组的普通成员。但不幸得很，这些文章被对立派说成是“省无联”的理论基础与组织行动纲领，送到了党内大理论家康生、陈伯达的案头，他们立马将“省无联”与在北京出现的所谓“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地下组织等同起来了，最终导致了中央高层对整个“省无联”组织的严厉否定与重力摧毁。

现在我们客观分析一下，造反兵团与“省无联”是否有何相似之处？

首先，兵团只是北师大一个以学生为主体的二百人的小组织，既没有参加任何跨校、跨行业的组织，也不是任何司令部、联合会的成员，应该是最不“大杂烩”的组织了。谭厚兰出于不知什么目的，一直诬蔑“兵团”是“大杂烩”，想必这话也传到了毛泽东耳中。

至于说“省无联”，只是文革中被最高领导否定、打倒的诸多群众组织中的一个。但非常独特的一点是，它的垮台不是因为派性，不是因为武斗，而是少见的“思想罪”，很多人都把“省无联”当作是异端怪论的代名词。谭厚兰也常常借此攻击王颂平等思想活跃的一介“兵团”核心人物。由此可以推测，“省无联”式的大杂烩应该是谭厚兰向中央告状时给兵团常扣的一顶帽子。毛泽东当着谭厚兰的面重复这句话，支持安抚的意味甚浓。

不可否认，毛泽东的话有对“兵团”的严厉批评，例如说还要搞反夺权，其他学校也参加了，应该是指“9.7事件”。但毛泽东肯定不是为兵团定性，把它打成“反革命的大杂烩”。最有力的证明就是：如果毛泽东有丝毫这个意思，就不可能不经由中央文革传出，那么，“兵团”顷刻间就会土崩瓦解，落得和“省无联”一样的下场。但“兵团”不但一直坚持到毛泽东的这次接见，而且在谭厚兰的“公社”解散之后又继续坚持了两年多，成为北京高校的最后一个小山头。请问，这是“省无联”式的大杂烩能够享受到的待遇吗？

问题二：“兵团”与谭厚兰的“公社”的根本矛盾究竟是什么？

文革中的红卫兵，都自认为自己才是最忠于毛主席的，他们和对立派的斗争都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的一部分。今天看来，这当然既幼稚，又可笑。1967年后的北京高校被分为“天派”和“地派”两大派，但谁能说清两大派的根本矛盾是什么？被认为“天派”领军人物的蒯大富和聂元梓在他们几十年后的回忆录中甚至根本就不承认“天派”“地派”的说法。蒯大富说：“我们跟谭厚兰关系也不算好，我们和她在政治观点上并没什么对立的，但是有些讨厌她，觉得她个人为人也有些霸道。现在我都记不清楚他们两边有什么政治上的不同见解或者反对谁、保谁。”聂元梓说得更直接：我从来不接受“五大领袖”的提法，也不接受所谓“天派”“地派”的划分。所谓“天派”“地派”是很模糊的。“地派”倒可能是形成了一派，而反对“地派”、与“地派”不一致的，就划到了“天派”里面。——北大不是天派，也不是地派。中央文革扣帽子说，北大是天派，可是——我们的主张并不都是一致的。

“兵团”和谭厚兰之间的斗争也大体如此。从根本上说：虽然双方都把矛盾上纲到路线斗争的高度，但又能比“天派”和“地派”的斗争高到哪里去？说到底，他们真正的分歧是在校内。简言之，在涉及学校的任何问题上，双方无不尖锐对立，互不相让。这也和当时任何高校的两派斗争并无区别。

当然，如果抛开派性，两者之间还是有不小的区别的。谭厚兰作为五大领袖之一，校内的女皇，难免变得骄横、霸道。“公社”作为掌权派，以强凌弱，鱼龙混杂，自大妄为，难免失去人心。而谭厚兰紧追关锋、林杰，的确也干了许多坏事，文革后受到清算和惩处，也是罪有应得。相比较之下，“兵团”就没有那么多历史欠账，王颂平的下场与谭厚兰也有天壤之别。但功过是非，归根结底都是文革十年浩劫的罪孽。

当年，我们不都是一群一腔热血，但却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吗？❏

【本刊声明】

本 刊 声 明

《记忆》创设于 2008 年 9 月，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本刊的宗旨，并取得会员资格者，皆可获得本刊。

《记忆》主张众生平等，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记忆》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的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等内容，均受国家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未经著作权人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 xx 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方惜辰

信箱：fangxc1966@gmail.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